



第 34 期（总 34 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目 录

■ 新闻动态

| | |
|---|----|
| 书山探径求博雅 学海浮舟浸未名——北京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2016 年春季学期 新生开学典礼等入学教育活动圆满完成 | 4 |
| 2016 年全国两会上的北大声音 | 7 |
| 北京大学举办第三届志愿文化嘉年华 | 13 |
| “懂中国、懂世界、懂自己、懂社会” | 14 |
| ——北大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教学经验交流会举行 | 14 |
| 许智宏院士谈理想、追求与传承 | 17 |
| 国子监大讲堂第 137 讲：程郁缀教授讲“古典诗歌与人文精神” | 19 |
| 北京大学与江苏省人民政府签署“十三五”期间战略合作协议 | 20 |
| 美国 MIT 教授来北大交流科学混合式教学课堂先进经验 | 23 |
| 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 | 25 |
| 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来访 北京大学-耶鲁大学交流周举行 | 26 |

■ 网教之声

| | |
|-------------------|----|
| 中国教育信息化“十三五”展望 | 29 |
| 慕课时代下教师面临的挑战与角色定位 | 34 |

■ 北大人物

| | |
|---------------------|----|
| 倪晋仁：聚沙成学科之塔 滴水穿攻坚之石 | 38 |
| 席振峰：等闲识得燕归来 | 41 |

■ 学者谈读书

为什么读经典 ----- 46

叔本华：比读书更重要的是什么？ ----- 52

■ 好文共赏

季羨林自传（上） ----- 56

■ 史苑钩沉

回忆周炳琳老师 ----- 64

■ 大美北大

风穿花间春初浅 ----- 70

■ 学员心声

北大的细节 ----- 73

■ 编辑寄语

春，寄来些花。风做她的信使，阳光为她伴唱。每个挤在枝头的可人儿，都有一个秘密，你开心地笑，她们便会慷慨地说给你听。又一年，春到燕园，本期大美燕园记下燕园春花。

祝愿每一个人春天愉快！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关海庭、张虹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吴晓风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曾玉芬、郑鹃、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李文文

新闻动态

书山探径求博雅 学海浮舟浸未名——北京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2016 年春季学期新生开学典礼等入学教育活动圆满完成

2016 年 3 月 19 日上午 9 时，北京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2016 年春季学期新生开学典礼在北京大学电教楼 314 教室隆重举行。北京大学继续教育部副部长刘广送老师，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杨虎老师，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章政教授，计算中心副主任崔建教授，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以及各院系的相关负责老师出席了本次开学典礼，典礼由继续教育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主任助理唐海峰老师主持。来自北京学习中心、知金北京数字化学习中心的 100 多名新生参加了开学典礼。本次典礼通过网络向全国 60 多家学习中心进行了现场直播。



9 点整，在高昂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学典礼正式拉开帷幕。刘广送老师首先代表继续教育部向现代远程教育 2016 年春季新生表示了衷心的祝贺和热烈的欢迎。刘部长在讲话中寄语新生，希望同学们要有勤学的决心、求知的贪心和掌握求知方法的玲珑心，遇高人不交臂而失之，到宝山不空手而归，充分利用北大提供的学习环境和条件，矢志成才。



杨虎老师代表继续教育学院对新同学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在讲话中要求同学们在未来的学习中，不断思考并

解答三个问题：为什么而来，留什么而去和带什么而回。希望同学们能够不虚度几年的宝贵时光，充分利用北大的优质资源，为自己的人生增光添彩。



章政教授在讲话中鼓励同学们打破思维定势，在学习求知之外，更要提高认识。他提到了北大的两位先生：“塔先生”和“湖先生”，希望同学们像博雅塔一样，正直，向上，挺直脊梁，敢于担当；像未名湖一样，有宽阔包容的胸襟。



崔建教授回顾了计算中心和继续教育学院多年的合作办学历程，勉励同学们珍惜学习机会，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目标，学会做人，并对学生提出的厚望：培养“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教师代表卢晖临教授在发言中从时光飞逝之“变”讲到人从高等教育当中所收获的“不变”——逻辑思维、表达与信息整合等基础性能力，各专业所要求的专业知识，作为社会成员所应具备的对于什么是好的社会的见识，以及为改善社会而行动的个人作为，以不变来迎接未来的万变。



典礼结束后，政府管理学院李春老师为新生带来了入学第一课——“学风考风和学习方法”讲座。在讲座上，李春老师详细讲解了北京大学对于考风考纪的要求，并与同学们一起分享了学习方法和心得。活动最后，100多名学生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游览了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等知名景点，加深了对北大风物和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新生代表 2016 级季繁菲同学在发言中表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认真完成在北京大学的每一门课程，努力在自己新的起点上，学有所成，学有所获。2012 级秋季学生王永涛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与新生们分享了在北大几年学习生活的心得体会。



典礼的最后，出席本次开学典礼的领导和老师在《燕园情》的歌声中为新生代表佩戴上了北京大学纪念校徽，北京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2016 级新生开学典礼顺利结束。

当天下午 1 点半，班主任老师为新生做入学培训，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了报到注册的相关工作。2016 春季入学的新生已于近日正式开学，拉开了他们在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习的帷幕。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编辑：丁香的耳朵

2016年全国两会上的北大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就记者提问“为什么说高校改革是供给侧改革重要的一环？”回答道：对国家来说，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校的作用至关重要，转型、创新、产业发展……必须要有人才支撑，培养不出优秀的人，任何发展都是没有基础的。我和很多企业家聊过，听他们的想法和需求，其实教育也面临着相似情况。老百姓都希望获得公平的、高质量的教育。但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也面临着很多体制上的困惑、障碍、束缚。对大学来说，供给侧改革，就是怎样把原先的束缚和问题理顺。

针对“高校如何加强学生的创新意识？”问题，林建华认为：创新是教育的应有之义。过去教育偏重知识传授，轻视启发和把学生的潜力真正发挥出来。对大学而言，创新创业应该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要把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纳入大学的每一个环节当中，纳入每一个课堂当中，让学生主动发挥潜力，这也是我们进行教育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原校长周其凤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北京代表团举行的全体会议时提到，到2020年我们将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的行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60%，这个伟大目标的实现同样也跟教育分不开。他认为，教育是个慢工细活儿，要禁得住时间的检验，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情况更是千差万别，所以对教育要有点耐心，不要急着出经验，更不要急着推广经验，要深入调查，多方听取各界意见。针对我国目前职业技能人才严重短缺的现状，他认为要大力发展中国职业教育，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完善《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从法律的角度对职业教育有更好的保障。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一向是两会舆论场上媒体的追逐焦点。3月7日，在审议“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的小组审议会间隙，厉老又被媒体围住。

十余年来，扶贫工作早已是厉以宁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86岁高龄的他，

依然奔走在扶贫路上。在接受采访时，厉以宁也从依靠特色产业、易地搬迁、教育扶贫等方面作出了解释。

厉以宁也以贵州毕节为例，再次阐述了教育扶贫的重要性。“此前当地有一所综合性学院改为了贵州综合工业学院，进行职业教育。”他对记者表示，“以前学生很难找工作，但现在和企业合办专业，既为企业输送人才，又解决了就业问题。这样就能帮助年轻人脱贫。”另外一个例子，则是专门建立一个教育园区，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教育，“比如农村缺乏护士。”厉以宁表示，就培养护士，也能起到同样效果。

3月6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召开记者会。厉以宁介绍说，中国当前依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但是重点不是“大摇大摆”，而主要表现为定向调控，重在微调，重在预调。同时，投资和消费并没有大幅度减少，还有很多高速铁路、交通设施、港湾建设、水电站、互联网等领域的投资项目将要推进，这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体现。

厉以宁特别指出，当前民营经济的活力正在发展起来，他建议大家到北京的中关村看看，在那里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后、科研机关人员、民营企业家，

都在讨论创意、创业、创新。“这就是中国的未来。从这里看一个蓬勃的创新时代正在向我们走近或者说正要来到。”厉以宁说，对中国的经济应该是有信心的。

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厉以宁表示，目前供给侧改革面临两大困难：一是关停企业导致职工下岗。“中央现在的政策是包下来，与其养亏损的企业，不如养职工。职工生活有着落了，经过培训可以重新找到工作岗位。”另一大困难是补短板，补短板必须创新，也必须在结构上做一些调整。“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信心克服这些困难。”厉以宁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去产能是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应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发力，通过“汰劣存优”来实现提质增效的去产能。

全国政协无党派界别小组讨论上，林毅夫发言时表示，“十三五”期间中国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投资补足短板，中国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能达到，质量也会很高。

林毅夫表示，“十三五”期间实现经济增速 6.5% 以上，我们的条件还是很好的，即使有产业产能过剩，但都在中低端，可以升级改造，这些升级都是好的项目，经济投资高。此前的基础设施投资很高，但大部分是连接城市与城市的高速路、高铁、机场等，但城市内的基础设施还欠缺。我国的城镇化将以每年 1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这些都是较好的投资项目，能够助力中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国际上一般认为 3% 是政府每年财政赤字的“天花板”，林毅夫认为中国的国情是不同的。“发达国家政府赤字主要是用来支付社会消费，比如失业金、福利等，不会提高生产力；发展中国家债务绝大多数是用来支持投资的，中国的债务相当一部分作为消除基础设施瓶颈、环保、城市化等方面的投资，这些投资在短期会创造需求，也能增加就业，从长期来讲，能提高生产率、形成资产。我们是有资产的，所以净债务实际上不高。”林毅夫认为，我国的“政府债务可以突破 3%，只要它的去向好”。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闵维方认为：要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世界一流大学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企业创新必须依靠一流大学培养的有创

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必须以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水平基础研究为支撑。因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我们必须以学科建设与教师培养为核心，根据学校自身的历史传统和优势，因地制宜，彰显个性，办出特色。

关于雾霾治理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鲁安怀**认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详细列举了推进重点城市“煤改气”，加快淘汰黄标车、实施国 VI 排放标准等一系列措施……一系列措施的落实，不仅能够带来天蓝、水清、草绿的生态环境，而且能够为老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仅就北方冬季取暖一个问题而言，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应通过改气、改电减少点源排放。

3 月 7 日，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四次会议科技界别的小组讨论上，委员们对“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对科研投入和衡量科技进步的两个数据展开了热议。“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指出，到 2020 年，我国要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 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朱星就 2.5%和 60%这两个关键数据、以及科研人才的培养和科研管理体制的话题接受了中国网记者的专访。

对于如何理解 2.5%和 60%这两个数据的含义，朱星认为：这是非常重大的两个数据，可以说是让整个科技领域都深受鼓舞。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这一比例在 2015 年是 2.01%，科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希望提高两个比值，一个是呼吁 R&D（研发）占 GDP 的比，另外一个基础研究占 R&D 的比，从 2.01 提高到 2.5，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意义重大。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曾提出，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不受制于人，对于记者提出的我国还需要多久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朱星说：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这也说到根本问题上了。目前我国整个工业都发展得很快，国民经济的总量也增长得很快，但是其中原创性的引领，还相对比较少。创新一般分原始创新、引进消化、综合创新三个类型。现在有一种创新是引进他国的技术，根据自身的需要做集成，这种创新在投入和产出比上会比较高，也见

效快，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创新更重要，坦率地说，目前还有较大的差距。

“在大数据时代，隐私和安全是双刃剑，在保证网络安全的情况下，注重个人隐私保护等相关工作还有待完善。”全国政协委员、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李晓明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李晓明表示，今年的提案将聚焦于教育领域的信息化数据开放工作，通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共享协议，推动数字化资源共享。同时，李晓明建议国家非敏感的公共数据也可以通过这种开放的形式，降低成本。

李晓明最后强调，政府要在观念上大力宣传，让大众对大数据的利用形成正确的认识。推进与个人隐私保护相关的政策法规框架的建立。要重视个人隐私保护的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运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副院长湛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推进丝绸之路上多元宗教与多元文明的系统研究。

湛如委员谈到，古代丝绸之路上宗教异彩纷呈，交相辉映。除了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早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宗教还有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摩尼教等。丝绸之路上宗教间的双向流动促成了中西文化的接触

和深入交往，相关地域人们的精神生活，为我们审视和研究当今多元宗教情况提供了开阔的历史文化背景。

湛如委员提出，在建设一带一路的今天，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与礼乐文明，并加强有关科研经费与学科支持，对我们理解把握沿路区域各国的文化走向与可能走向、促进不同宗教的、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与和睦和美，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解决罕见病患者就诊困难、经济负担过重以及部分罕见病药品匮乏等问题，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北大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建议建立罕见病的大健康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和补充医保用药目录，将罕见病药品、试剂以及相关治疗器械等分期分批纳入医保范围。

3月3日，丁洁建议适当上调儿童诊疗费，增加的部分通过扩大儿童医保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等措施来弥补，同时制定针对儿童医院、设有儿科的综合性医院的专门补偿机制，缓解当前儿科“亏本经营”的窘境。丁洁表示，“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儿童是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群体，而儿科医生是儿童健康的守护神，这部分人理应得到更好的尊重和呵护。丁洁在提案中建议引导人们正确

认识儿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有完全学科发展史和学科体系的事实，尊重和呵护现有儿科医护人员，提高他们的职业自豪感。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寿命的延长，老年人以及高龄老人越来越多。而从医学角度讲，年龄越大，患病几率越高，尤其是一些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医疗支出也很高。目前，职工医保实行的是退休人员不缴费政策。随着老龄化进程，退休人员占比会越来越高，缴费的在职职工比例会越来越低，在现收现付模式下未来医保基金的负担会越来越重。为解决这一问题，吴明提出，退休职工缴费可以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费，医疗费用还可以通过多方筹资来解决，包括政府、单位和个人。同时，要加大医保基金的监管力度，通过支付方式改革等举措，激励医院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主动控制成本，如减少过度提供服务、有动力压低药品耗材进价，以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轻医保基金的压力。

目前，高血压筛查及糖尿病管理已经被纳入到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中，但是还缺少血脂管理。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教授**

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我国心血管病患病率仍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基于此严峻的形势，呼吁政府把血脂管理纳入到公共卫生服务当中，“这样才能使我国从总体上控制三高，使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及死亡率下降”。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借助互联网技术，移动医疗可以成为现有医疗模式下的重要支持手段，对于众多移动医疗企业来说，除了从预约挂号、支付方式等方面切入诊疗流程外，能否真正落地至关重要。

陈仲强认为，多数移动医疗平台还在天上“飘”着，没有真正落地，毕竟医生与患者之间面对面的问诊过程有时不可替代，对患者来说，医生在医疗机构中的执业也让医疗行为质量可控。他说，移动医疗手段仍是在现有的疾病诊疗模式下对诊疗服务流程提供有力的支持，而不是替代，从这个角度来说，移动医疗的发展大有空间，因为效率的提升本身对医院的管理不可或缺。

最近“号贩子”这个词很热，**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

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针对医生“忙闲不均”的情况普遍存在导致“看病难”的问题，刘玉村提出要改善基层、社区医院的诊疗水平，明确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职能定位和疾病诊疗范围，还要通过媒体宣传，转变老百姓的就医观念。另外，刘玉村还呼吁恢复以往行之有效的挂号制度，即由护士站根据患者病情合理安排医疗资源，保证患者得到恰当治疗。

刘玉村认为，对医生看病到底值多少钱，应该有一个基本估价，但是现在的挂号费、手术费很难体现医生的真实价值。对此，他建议采用“见人为主见物为辅”的定价机制，根据医生的医术水平和诊疗服务确定收费标准，让付出得到合理的回报，从而使整个行业快乐和高尚起来。

70%左右的地方开展分级诊疗的试点，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要求，**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口腔医学院教授俞光岩**说：“我们下到卫生所，里面穿白大褂的比病人还多。”

大医院忙不过来、基层医院病人又少，俞光岩为此建议：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能力的培训；同时建立

转诊制度，对前来大医院看病的人员进行筛选和分流。

伴随着今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孕妇数量激增。孕妇到医院“建档”困难，产检困难，产房产床、医生、护士、助产士等都出现紧缺现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高炜为此建

议：一是适当增加三甲医院产科床位，二是要加强基层产科医生的培养，三是适当增加妇产科和儿科人员编制，四是要增加医务人员的劳务报酬。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北京大学举办第三届志愿文化嘉年华

春风吹散了多日的雾霾，在3月5日雷锋纪念日当天，校团委、北大青年志愿者协会在新太阳学生中心大厅举办了北京大学第三届志愿文化嘉年华。以志愿服务搭台、雷锋精神引领，校内外志愿服务团队在这里进行了项目展示和现场服务，展现出北大青年的活力与校园生活的精彩。

本次嘉年华阵容盛大，参与的各院系青年志愿者协会、志愿类社团和社会公益组织总计40家。参展团体围绕各自开展的志愿服务项目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法学院关于大学生消费权益保护的介绍、生命科学学院用“显微镜下看发丝”引出的为癌症患者捐献头发的“青丝行动”，以及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准备的垃圾分类地图、人民医院志愿服务队的健康医疗常识连连看等，均

让参与的同学乐在其中。“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也通过这些照片展、趣味游戏、现场体验、有奖竞猜等生动的形式传递给学生们。在活动现场吸引眼球的吉祥物则是另一大亮点，“呆萌”又可爱的吉祥物齐聚一堂，使得整个嘉年华气氛热闹非凡。





学生们在观摩和体验志愿服务项目



师生们和吉祥物合影

嘉年华不仅仅是北大青年志愿者的嘉年华，更是北大志愿活动的一个对外窗口，校外公益组织的加入也使得此次活动更加多元和精彩。致力于促进中国城乡教育公平的非营利性组织“毅恒挚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届的嘉年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机会，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

参与到志愿服务中去。不仅如此，校外公益组织的专业化、科学化、精致化也成为校内志愿团体学习的方向和目标。

志愿精神是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继承和深化。本届文化嘉年华活动将志愿公益与趣味性活动融为一体，不仅调动和提高了同学们的积极性与参与度，更是对志愿公益方式的创新和探索。以嘉年华活动为开端，校团委将组织校内志愿服务团体持续开展一个月的“雷锋月”系列活动，由各院系、社团的志愿者们发挥自身的学科与专业优势，在校内外开展多彩的志愿服务项目，传承雷锋同志助人为乐、敬业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展现北大学子“用我智慧奉献爱”的良好风貌。（文/新闻网学生记者 魏晗博）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懂中国、懂世界、懂自己、懂社会”

——北大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教学经验交流会举行

2016年3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教学经验交流大会在凯原

楼报告厅举行。大会邀请到上学期和本学期开设的31门通识核心课的老师 and

助教，研讨北京大学通识教育建设工作，交流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教学经验及学习体验。北京大学副校长、教务长高松，副教务长李沉简、方新贵，通识教育核心课教师、助教及学生代表，及来自校内外相关部门和院系教师代表参加了会议。教务部部长董志勇、副部长强世功分别主持会议。

高松首先致辞。他强调要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结合作为北大教育教学改革的方针，在专业教育中贯彻通识教育的理念，让学生对所处的社会、自然、人本身产生客观理性的认识，培养起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高松希望在核心课程的建设过程中能梳理出课程的目标、选择的标准以及建设的方法。最后，他向工作的参与者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向北京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主讲教师代表颁发聘书。



副校长高松与获颁聘书的核心课程教师代表合影

为了推进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建设，学校拟成立通识教育专家组，李沉简教授对此做了一些简要的介绍。本着蔡元培老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北大的通识教育委员会力图做到这样几个平衡：一是教师资历上老中青年的平衡；二是学科间的平衡，不仅重视人文社科，也注重自然科学；三是组成人员上的平衡，不仅有学术工作者，也有行政方面的老师。世界各地和中国兄弟院校有很多通识教育的实践，委员会将会参考他们的经验，走出一条北大自己的通识教育的路。

北京大学邀请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陆一老师对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开展了系统调研，陆一在本次大会上向大家展示了她的调研报告。通过助教在课堂上向选课同学发放网络问卷的方式，本次调研收集到了一千多份样本，用教学指标（即学生对教师和教学的评价）、学习指标（即学生对自己学习的评价）、收获指标（包括学生对自己收获的评价和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四个比较细腻的指标试图刻画出学生的上课情况，并对结果做归因分析。结果显示，由于课程设计的不同，各门课在各项指标上的表现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学生们的选

课动机大多是积极的，对课程也有较好的反馈。



陆一老师作调研报告

随后，“中国古代政治官僚制度”主讲教师阎步克、“圣经释读”主讲教师高峰枫、“化学与社会”主讲教师卞江、“古代西方政治思想”主讲教师李猛及他们课上的学生代表分别就他们开设的通识核心课与大家分享教学经验，对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

阎步克强调，要想在课堂上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必须靠课程的思辨力。因此，他更为重视章节的建构，以让学生有环环相扣的感觉，并通过适当地展示历史细节帮助学生在文化上对制度形成更多的认识。



阎步克老师发言

高峰枫开设的“圣经释读”课程是与专业课合并上课的课程之一。高老师结合他对通识教育的理解，重新设计了课程，针对各个文献不同的特点选取最适合它的方式去解读。在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开放的课堂中，他也接触到了很多来自不同院系的学生，展示出非常优秀的英语阅读与写作水平和文本领悟力。

卞江介绍了他对“化学与社会”一课所做的教学改革。一方面，他重新设计教学大纲，把课程重点放在化学与人文、社会的衔接上。此外，他强调阅读，注重过程考核，希望学生通过课程学习了解到科学与人文、宗教所不同的解释世界的方式。

李猛分享了他在设计“古代西方政治思想”课程时的体会。他指出，通过设计系列课程和增加阅读材料的多样性，可以更好地帮助不同背景的学生理解和接受相关知识。他还指出，通识教育不仅应当包括激发兴趣或获取某一学科基本知识的课程，更应包括一类具有更高课程难度和要求的课程，以达到学术训练的预期效果。



李猛老师发言

在最后的讨论环节中，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师陈徐宗、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师吴国武等人分享了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和对

北京大学通识教育下一步建设与发展的期待。

最后，强世功作了会议总结，并介绍了北京大学通识教育改革思路。他指出，将进一步确立稳定的核心课程体系，以期让好的老师遇到好的学生，一起推动北大的课程建设。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拉丁

许智宏院士谈理想、追求与传承

2016年3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原校长、生命科学学院许智宏院士做客第44期“教授茶座”。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而新太阳学生中心432室内，老师与同学围坐，品茗畅谈，茶香缕缕，却是一番热闹的景象。活动中，许智宏讲述了自己求学和工作中的经历，分享了很多校友的故事，平实的话语浸润着同学们的心灵。法学院2015级本科生赵雪松担任学生主持人。

许智宏从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谈起，他动情地回忆道：“那个时候大家的日子过得真苦啊，可是回想起来，人生的苦难经历中有时也包含着乐趣，那些往事甚至令你回味无穷。”许智宏随即分

享了自己在乡下赶毛驴、做煎饺的故事，朴实而又幽默的话语惹得同学们一阵欢笑。他提醒同学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样一件事情，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认识。有些事情也许让你不高兴，甚至觉得痛苦和煎熬，但是从这些事情中往往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年轻人要抓紧时间，很多时间是不知不觉丢掉的。有的同学说没时间锻炼、没时间看书，实际上时间是一定可以挤出来的。”许智宏尖锐地点出了年轻人中普遍存在的时间管理问题，他轻呷一口茶，手指轻轻摩挲茶杯，向同学们讲述了自己在“文革”期间坚持每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书的故事。他说：

“永远不要因为条件而轻言放弃，很多时候要自己创造条件去实现事业追求，想尽办法去做，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



许智宏院士做客第44期教授茶座

当有的同学提出自己面临的选择太多，不知道怎样抉择的时候，许智宏第一时间回答了同学的疑问：“读大学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知道自己想学什么、未来想干什么。北大有广阔的天地，有各种各样的资源供你去丰富自己、充实自己。”许智宏以自己认识的一位校友为例，形象生动地讲述了这位校友放弃微软的工作选择飞行员职业的故事。他说：“大学生毕业择业时会考虑收入、待遇等一些关乎养家糊口的问题，这很正常，但是不能只关注这些。从长远看，就业选择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立足个人的能力和兴趣。”

针对大学究竟应该学习什么，许智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自然科学是千变万化的，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也许有一

天会过时，因此比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老师教你的那些基本的理念和方方法，在此过程中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努力保持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眼光。”他用慈爱的目光环顾同学们，自豪地说道：“北大自由和宽松的环境让同学们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在学术上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和老师交流不同想法。”

有的同学对当今社会应该坚守什么感到困惑，许智宏略一沉思，回答道：

“做人要有基本的道德准则，高尚的品格要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北大学生要自觉抵制社会上不良风气的侵蚀。”许智宏的声音掷地有声，隐隐透出他坚决的态度。

活动结束后，许智宏与同学们合影留念。他还亲笔给同学们留下了寄语“慎思”。



师生合影留念

教授茶座是学生工作部于2014年3月推出的一项师生交流活动。这项活动

以新颖的教育形式搭建师生沟通的桥梁，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不谈学术、只谈人生，让老师更加了解学生所思所想，同时以老师的人生经历、人格魅力影响学生，实现思想碰撞和情感交融。教授茶座每周举办一期，每期都有不同的教授带来不同的故事，给学生带来不一样

的心灵滋养。“燕园学子微助手”微信平台为学生提供教授茶座的活动通知和报名通道，并分享教授茶座微语录。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国子监大讲堂第 137 讲：程郁缀教授讲“古典诗歌与人文精神”

2016 年 3 月 5 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北京市东城区社区学院 309 教室内春意盎然，人头攒动。由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与北京市东城区教委联合举办的“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新学期第一次讲座（总第 137 讲）在这里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程郁缀作题为“古典诗歌与人文精神”的讲座。

程郁缀从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诗经》讲起，回顾了中国诗史的发展脉络，他指出，公元前 300 年至公元 200 年是中国诗史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楚辞和建安文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通过对屈原的《离骚》、曹操的《观沧海》等诗歌的分析，程郁缀介绍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特点和作者的人文情怀。接着，他带领学员们走进了中国诗史发展的第二次创作高潮，即唐宋时期，唐代诗歌数量多、诗人多，蔚为大

观。从初唐的陈子昂到盛唐的李白、杜甫、中唐的白居易，再到晚唐的李商隐、杜牧，程郁缀娓娓道来，并对李白的浪漫天才和杜甫的忧国忧民进行了深入解读。通过上述的讲解，以及对唐代诗人贺知章和宋代诗人曾巩同名诗作《咏柳》的分析，程郁缀总结了两个朝代诗作的不同特色，即唐诗重情趣——读唐诗如饮美酒；而宋诗重理趣——读宋诗如品茗。



讲座现场



讲座的后半部分，程郁缀以怀乡诗为主题，带领学员们回顾了中国诗史上著名的几首怀乡诗，诸如屈原的《哀郢》、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李白的《静夜思》、孟郊的《游子吟》等。他和学员们一起重点分享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二首》（其二），向学员们解读了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程郁缀指出，“爱家乡是爱祖国的感情基础，爱祖国是爱家乡的感情升华。每个人都有三个母亲：给你身躯和肉体的母亲、给你知识和能力的母校、给你尊严和精神的祖国。面对这样深重的恩

情，我们应当怎么办——涌泉之恩，大海相报！”

在两个小时的讲座中，程郁缀将中国古典诗歌的精髓和人文精神洋洋洒洒地展现在学员面前，他的语言或幽默风趣，或旁征博引，不时赢得学员们热烈的掌声。

讲座开始前，由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和东城区教委共同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开学仪式，向听众介绍了本学年的课程安排和讲座的相关注意事项。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北京大学与江苏省人民政府签署“十三五”期间战略合作协议

2016年3月12日，北京大学与江苏省人民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志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石泰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林建华出席。签约仪式由北京大学副校长王杰主持。

江苏是中国东部重要省份，一个多世纪以来，江苏与北京大学渊源深厚、交流密切。2004年3月9日，双方签订了省校全面合作协议，科技、教育、人

才、产业等各项合作全面推进。2012年3月8日，双方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合作领域进一步扩大、合作层次进一步提升。“十二五”期间，江苏与北大合作的项目数量和体量在全国各省市处于领先地位。双方科技合作项目超200项，合作金额上亿元，新建5个院士工作站和10个共建载体。近五年，北大为江苏输送毕业生（含定向选调毕业生和大学生村官）400多人，60余支学生社会实践团赴江苏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动。当前，正值江苏凝心聚力、率先腾飞之时，北大深化改革、冲刺入列之际，双方签署“十三五”期间战略合作协议，将在探索协同创新载体新途径、技术转移新模式、毕业生赴苏工作及定向选调新机制，以及共同开展国际合作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协议的签署是省校共同推动国家创新战略、产学研合作的重要举措。

朱善璐代表北大师生日工热烈欢迎罗志军书记、石泰峰省长一行。他说，江苏是与北大开展战略合作历史最久、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省市之一，在北京大学的发展格局中占据关键地位。当前，江苏和北大都处在发展的关键期，双方分别作为国家区域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排头兵，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双方的传统友谊和密切合作，利用彼此优势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现代化建设大局多作贡献。“十三五”期间，希望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以重大合作项目为抓手，在人才培养方面，北大将积极输送更多的优秀毕业生到江苏工作；在科技合作方面，双方共同推进校地科技合作的体制机制创新；在国际交流方面，双方还可以探索面向全球吸聚顶尖技术和人才资源的创新模式。朱善璐强调，省校携手推进校地合作迈

上新台阶，不仅会对江苏省实现“两个率先”提供新的助力，也必将对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强劲的动能。



朱善璐发表讲话

罗志军在讲话中表示，江苏正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考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努力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江苏省热切期待与北京大学建立更加全面、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他还提出打造省校合作“升级版”的四点建议：一是更高标准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创新载体，形成若干国际化、高水平的产业研发创新中心；二是更大力度推动北大毕业生到江苏就业创业，推动更多的北大专家、教授、管理团队到江苏开展研发合作，提供创新服务；三是更实举措探索省校协同创新的新机制新路径，鼓励和支持江苏企业到北大设立实验室或研发中心，鼓励和推动北大创新成果到江

苏转化产业化；四是更加积极地拓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联合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到江苏创新创业，支持江苏企业“走出去”，共同设立海外研发中心。

林建华和石泰峰分别代表北京大学与江苏省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后，罗志军、石泰峰、朱善璐、林建华等省校领导与北大江苏籍学生代表和即将赴江苏工作的选调生代表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



省校领导与北大江苏籍学生代表等合影

江苏省委常委、省秘书长樊金龙，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省委常委、副省长徐鸣，副省长曹卫星，南京市市长缪瑞林，省有关部门和省辖市的负责同志，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

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敖英芳，党委副书记叶静漪，副校长李岩松，副校长、教务长、中科院院士高松，副校长、总务长王仰麟，中科院院士、党委组织部部长严纯华，中科院院士、副教务长、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龚旗煌，中科院院士、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黄如，副教务长、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关海庭，以及医学部、工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分子医学研究所、党办校办、国内合作办、学生工作部、科研部、科技开发部、校团委、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等院系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了签约仪式。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美国 MIT 教授来北大交流科学混合式教学课堂先进经验

蚊子如何在雨中飞行？冷是有多冷？肥皂泡泡里面有什么学问？怎样不靠爬杆就能测量旗杆高度？

这些问题来源于人们的生活，可能常常被人们当作是经验直觉，而不值得探究，但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Richard Larson 教授领衔的 BLOSSOMS 团队看来，却成了帮助高中生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钥匙”。

BLOSSOMS 课程怎样通过探究解决这些问题，进行前沿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BLOSSOMS 与中国又有怎样的渊源？

2016 年 3 月 18 日，在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北京大学教育研究中心和 BLOSSOMS 合作举办的“BLOSSOMS 与中国教学改革”研讨会上，就上述话题，MIT BLOSSOMS 负责人 Richard Larson 教授及项目官员 Elizabeth Murray 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北师大二附中等北京名校的老师代表进行了交流。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表示，大学为本科教育设定了一系列教育目标，例如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精神等等，但如果到了大学再培养这些能力

就太迟了，因此，需要大学和中学共同携手，帮助学生在中学阶段就逐步培养起探究式学习的能力。BLOSSOMS 项目立足于 MIT 的教育理念，从数学、科学和工程入手，帮助学生从真实生活中发现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启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对科学的兴趣，能够为学生带来更好的教育体验。他希望在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的努力下，能够推动更多的中国学生受益于 BLOSSOMS 项目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BLOSSOMS 虽然是一个免费互动性教学视频库，听起来与慕课相似，但它并未放弃课堂上的教学。

当日上午，Richard Larson 教授就在北京知名中学教师代表面前，展示了自己的教学绝活。

“这些课不是被设计成死板的讲课，而是气氛活跃积极的课堂。”Richard Larson 说，在 BLOSSOMS 课堂里，视频被分成了几个片段，学生们也被分成小组合作学习。

学生们被要求跳出课本或传统的教学材料，不能死记硬背，从公式到公式，而要像真正的科学家、数学家或工程师

一样，自己去思考、寻找和建构解决问题的方案。

课堂老师也不能闲着，他们不能照本宣科，或简单依赖视频，而需要鼓励和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进行探究式教学和积极主动式教学，代表着一种 21 世纪的教学技能。

“我们把这种新颖的教学模式叫作‘教学二重唱’。” Richard Larson 教授说，BLOSSOMS 的理念就是：设计一种从一开始就有停顿的分段式教学课，从而把视频里的教学和课堂内的教学以一种有机整合的方式呈献给学生。

秦春华认为，也许这样的理念并不新奇。但提出一种理念是一回事，能够将其实践并制作成课程是另一回事。BLOSSOMS 项目的核心是课程，通过由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根据中学生的特点设计一系列跨学科课程，可以更好地激发出学生对科学和研究的兴趣和想像力，并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一般而言，BLOSSOMS 视频课设计时长约为 50 分钟，设计者们希望，能够演示数学、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思维，将抽象的概念和现实世界联系，展现出理工科的魅力，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日上午，BLOSSOMS 项目官员 Elizabeth Murray 女士还向与会代表介绍了 BLOSSOMS 与中国之间的渊源。渊源始于 2004 年 10 月的宁夏，那时，Richard Larson 教授和 Elizabeth Murray 女士发现，宁夏当地老师在课堂里会给学生们播放由上海、北京的老师们制作的教学视频片段，但每隔几分钟就不得不暂停播放，和学生们进行积极的教学互动。

这给他们带来了关于 BLOSSOMS 视频课的灵感。此后，Richard Larson 教授表示，MIT BLOSSOMS 一直秉持传统，在课堂内老师的帮助下，把优质教学带到每一个课堂。

“通过引入 BLOSSOMS 视频课，当地课堂内老师的作用不会被削弱，反而是得到了提升。” Richard Larson 教授说。

2014 年初，Richard Larson 教授和 Elizabeth Murray 女士还专门到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进行培训，并计划指导重庆二外的部分理科老师制作多门 BLOSSOMS 课程，通过 BLOSSOMS 平台向全世界进行分享。

重庆二外就是 MIT BLOSSOMS 在中国的首个合作伙伴，而包括中国在内，BLOSSOMS 已经和 10 个国家建立了合作

关系,使得在 BLOSSOMS 平台上,能看到多国语言的 BLOSSOMS 视频。

Richard Larson 教授认为,BLOSSOMS 鼓励了解多元文化,通过视频课中不同国家老师们的教学,学生们就可以了解和欣赏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

截至目前,已有 12 节中文普通话配音的 BLOSSOMS 视频课在 BLOSSOMS 平台上线,其中,就包括重庆二外老师们制作的部分课程,另有 5 节视频课预计很快将进行中文配音。

经过此次研讨会,与会的北京知名中学教师代表表示,也将把 BLOSSOMS 的理念和经验带回学校,MIT BLOSSOMS 团队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延伸、扩展和中国的合作,如果有老师计划使用视频课,

或想要制作一节新的视频课,都可以获得网络指导和培训。预计北京中学的课程也将在未来登录 MIT 平台,向全世界分享。(文/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 许路阳)

延伸阅读:

BLOSSOMS 是一个缩写,来源于 Blended Learning Open Source Science or Math Studies,含义是科学或数学学习的整合开放资源。它是为帮助高中师生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习所创建的一个互动性教学视频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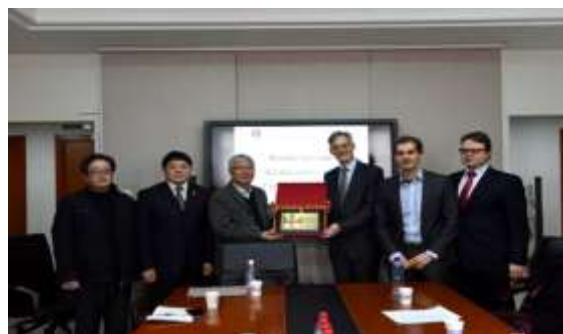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

2016 年 3 月 15 日,英国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代表团在副院长斯蒂芬森教授带领下来到北京大学访问交流。代表团首先访问了教务部,与副教务长方新贵、教务部部长董志勇及其他领导和教务部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会晤,就本科生教学与管理、本科生访学合作、教师发展、在线教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

气氛轻松融洽,双方加强了了解,增进了友谊,并在相关议题形成了合作意向。



交流座谈现场

随后，代表团参观了北大经济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分别就学生国际交流、信息科学技术教学以及教师联合培训等议题同相关各方进行了座谈，并对牛津大学暑期学校项目进行了推介，取得了良好的反响。

本次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代表团来访北大，在教务部的精心准备和经济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的积极配合下，取得圆满成功。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编辑：拉丁

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来访 北京大学-耶鲁大学交流周举行

2016年3月21日，耶鲁大学校长、世界著名心理学家苏必德（Peter Salovey）一行访问北京大学。北大校长林建华于英杰交流中心星光厅会见了苏必德一行。陪同会见的还有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医学部副主任方伟岗、心理学系主任方方等。

作为中美高等教育的两所知名学府，北大和耶鲁有着共同的理念和追求。北京大学与耶鲁大学的合作起始于1984年。三十二载风雨历程，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积淀的两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科研合作等诸多领域开展合作、携手并进。3月14日，耶鲁大学 Spizzwinks 男声阿卡贝拉清唱团与北大阿卡贝拉清唱社的联合演出拉开了“北京大学-耶鲁大学交流周”序幕。此次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率团来访将交流周推向高潮。

林建华对苏必德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双方就中美两国当今热点问题和时政要闻交换了意见，对彼此国际合作项目进行了探讨。苏必德认为：“东西方文化的深入研究和交流对于学生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的学生既需要读莎士比亚，也要能读懂孔夫子。大学应着重于教育事业，适当放松科研方面的投入。”

会见后，林建华和苏必德代表两校签署合作协议。协议拟建立两校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临床选修轮转制度，耶鲁将接收并培训来自北大医学部的高年级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为其提供更多临床经验。



协议签署现场

随后，苏必德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发表了题为“Emotional Intelligence: Is there Anything to It?”的演讲。苏必德首先用流利的中文向师生们问好，并幽默地介绍了自己中文名字的由来，引发了台下阵阵掌声和欢笑声。接着，苏必德为大家详细阐述了他长期研究的情绪智力理论。情绪智力理论致力于科学系统地解读和认识自己及他人的情绪。一般来讲，情绪智力包含四种关键的情绪技巧，即察觉情绪（perceiving emotions）、使用情绪（using emotions）、理解情绪（understanding emotions）及管理情绪（managing emotions），熟练使用这些技巧对于个人社交活动中的表现有重大影响。他与合作者共同研发了“Major-Salovey-Carus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st”——一种类似于IQ测试的评测系统，针对上述四个方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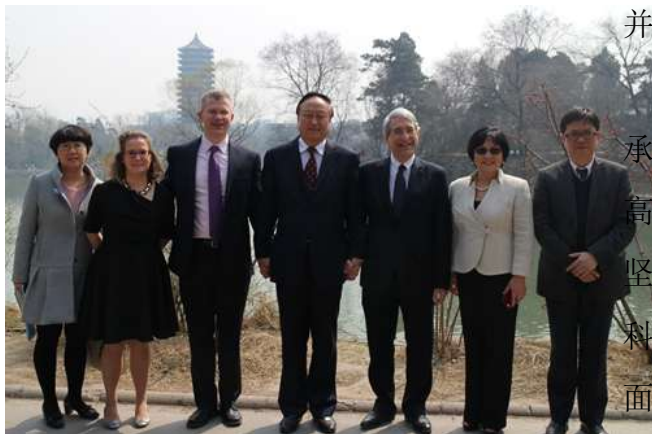
情绪技巧进行评估。苏必德又以自己接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会见的亲身经历，生动地讲述了管理情绪的重要性。随后，他向大家普及了目前情绪智力领域前沿的研究课题，并着重介绍了其中几项分别证明较高的情绪智力对于工作有效性、领导力、团队协作力、学业成绩存在积极作用的研究成果。最后，苏必德从实践层面出发，介绍了情绪智力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演讲结束后，他又针对同学们提出的高情商与道德、情商量化指标发展前景以及该理论在人际传播中的具体应用等问题进行了回答。



苏必德发表演讲

演讲结束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在鲁斯亭会见了苏必德，双方就两校长期合作发展的方向进行了讨论。朱善璐表示，在当今教育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全世界的大学都在积极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方向和主题。两校在未来应发展战略性的合作关系，在过去的良好合作基础上，探讨选择新

的发展方向，为世界东西方高等教育合作的探索作出贡献。对此，苏必德热情回应并以“联合”“创新”“参与”“发展”四个词来形容北大，认为北大在大学教育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理念。朱善璐提议希望能与耶鲁大学共同研究非洲方面的议题，同时邀请苏必德担任2018年北大120周年校庆的校庆委员会顾问。



朱善璐与苏必德校长一行合影

北京大学与耶鲁大学的合作源远流长，项目丰富，交流深入。每年都有数十位北大学生参加耶鲁暑期学校。北大-耶鲁博士生交流项目则囊括了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受到北大师生的高度关注。2006年初，两校法学院联合成立的“北

大-耶鲁法律与政策改革联合研究中心”在公共政策领域研究中卓有建树。在大学管理方面，北京大学也积极参与了教育部与耶鲁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高校领导高级培训项目（Chinese University Leadership Program），为两校管理层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除此之外，两校还与布莱尔信仰基金会联合开办了广大师生关注的布莱尔信仰基金课程，并共同举办了“世界校友领导力会议”。

百余春秋栉风沐雨，三十二载友谊相承。博雅塔依旧沉静，哈克尼斯塔仍然高耸。两校历经风雨的友谊之路历久弥坚。培养杰出的人才和贡献造福人类的科研成果是两校矢志不渝追求的理想。面对着学科发展的新变革和新挑战，北京大学和耶鲁大学也将共同创新，并肩向前。（文/艾新雅 陈星任 周思好 张越）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网教之声

中国教育信息化“十三五”展望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起始年，作为教育部教育信息化专家组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任友群参与了教育部《关于“十三五”期间全面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制定工作。在“第十五届中国教育信息化创新与发展论坛》上所作的报告中，任友群对“指导意见”进行了解读，强调推进教育信息化要以应用驱动建设、应用倒逼建设，强调了应用方面机制创新的重要性，以及“十三五”期间要完成的重点任务。

“十三五”教育信息化要以应用驱动建设

“十三五”指导意见的起草背景，我认为是对教育信息化的理解，以及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深入已非常到位了。中国举办着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51万所学校，1500多万专职教师，2.6亿在校生。我国基本上实现了扫除青少年文盲，以及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这对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大国来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也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不过，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还是我们最纠结的问题，一方面，仍然存在差异化很明显的教育现象，贫困地区的教育还是很糟糕，富庶地区则越来越先进。有专家曾经说过，中国高等教育更多的是考虑质量问题，但是基础教育一直受困于公平，所以，基础教育在谈质量的时候，都绕不开公平。不以公平为前提谈论质量，在基础教育界可能面临更大问题，这也是我们当下要考虑的。当下正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的中期。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一次起草的征求意见稿叫指导意见，而不是“十三五”规划。因为我们已经有两个正在实施当中的规划纲要，如果再做出一个，有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混乱。指导意见遵从的一个原则是，把“十三五”能够做到的事情落实到文件当中，不再从理念上探讨问题。实际上，在两个已经实施的文件中，理念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我们认为，

“十三五”期间要关注的是以应用驱动建设。以往，谈信息化首先谈的是建设，如今，基本建设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此基础上，则是要通过应用来驱动建设，倒逼建设。应用层面，我们认为，机制的创新更加重要，信息化在技术层面虽然存在困难，但还是比机制管理上的问题好解决一点。因为如果体制机制跟不上，再好的技术也可能发挥不了作用，所以，我们希望实现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全世界对于教育信息化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在起草指导意见的时候，也对比了全世界对教育信息化的关注。在这里，就不得不提2015年5月在青岛举办的“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会议。这次会议对我国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会议之前，教育部的一些领导，多位专家都深度参与到准备工作中。如果说此前我们参与国际性教育会议，更多的是抱着一种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的心态，这一次，则是另外一种心态：我国教育信息化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和经验，这种路径和经验是值得其它发展中国家借

鉴和学习的。可以说，这次会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今后，我们将一边继续学习发达国家，一边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经验、做法和成就。“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还有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亮点，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贺信中谈到了四个化和三个学：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我们这么多年的奋斗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认可，而且他还提出了更高瞻远瞩的指示，这对业界同仁来说是一件备受鼓舞的事情。青岛会议结束后发布的《青岛宣言》，集中了与会国的智慧和经验，对促进全世界教育信息化，进而推动教育现代化，让全民共享平等、包容、高质量的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机会，必将产生积极而持久的影响。它提出了“迈向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和终身学习”。“全纳”隐含着更深层次的公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只有富足到一定程度，才有力量去考虑特殊教育，它也体现了社会的文明程度。中国多年积累至今天，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去考虑“全纳”问题，当然后面的路还很长，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教科文组织刚刚出台了对2030年的教育展望，也提出了信息化时代造成的不

公平的新问题。信息技术能够促进教育公平，但是得不到信息技术的人则会更加被不公平对待。另外，数字鸿沟的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所以，公平可能依旧是很难绕过去的一个话题，在推动教育质量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会把公平放在首位。《青岛宣言》强调了探索公平的道路，包括这么几点：第一，打破信息壁垒。硬件壁垒已不难打破，但要打破资源和能力的壁垒则很难。第二，改变教师教育的模式，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新教师。第三，不断提升在岗教师的能力。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一师一优课等活动的成效继续发挥好，需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当然还要做好国际合作。所以，青岛会议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十三五”期间推动教育信息化的重点任务

“十三五”期间推动教育信息化的重点任务不过，现在面临的问题也不少：治理体系、教学模式、建设机制、管理应用、宽带的资费、运维费用、资源平台、人员队伍建设、教学空间、评估等，这些都是我们在指导意见中需要详细分析的，希望能够更好地支撑教育改革与发展，更好地推动教育思想和理念的转变，更好地服务师

生信息素养的提升，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形成与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作用。按照正常的五年计划，“十三五”只是又一个五年计划而已，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十三五”结束是2020年。国人对2020有很多特殊的期盼，其中包括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以及两个100年的宏伟目标，2020年将迎来第一个100年，这些新内涵对“十三五”有特殊的影响。我们在做指导意见的时候，提出了所希望的“十三五”期间教育信息化实施的基本原则：坚持要服务全局，坚持要融合创新，坚持要深化应用，坚持要完善机制。核心目标是希望建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要基本实现教育信息化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支撑作用和对教育创新发展、均衡发展、优质发展的提升作用；要基本形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发展的中国特色教育信息化发展路子。我们也对自己提出了一些要求：任务要保证能完成，应用要上台阶，安全要有保证，治理

要上水平。信息化一旦大规模实行，数据安全、信息安全会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的重点是希望完成四个提升和四个拓展，四个提升是指要全面深化“三通两平台”建设，提升教育信息化的应用水平。四个拓展指要坚持融合创新，拓展信息化应用的广度与深度。详细说来，四个提升包括：第一，深入推进“三通工程”，全面提升教育信息化基础支撑能力。第二，积极推动管理平台与资源平台的深入应用与协同发展。我们在搭建平台时可能会分几个平台，但是让一线老师和同学使用时，过多的平台或许会让他们很恼火。我们希望能提升应用和协同的能力，大幅度提升教育信息化服务教育教学与管理的水平。第三，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优先提升教育信息化兜底线、保基本、促公平的能力。信推办近两年实施了让优质资源覆盖所有教学点的工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程。第四，要加快探索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供给模式，有效提升数字教育资源服务水平。企业、国家、老师、同学、家长之间比较科学的模式还没有被探索出来，这其中有大量的工作要去，这是“十三五”期间面临的一个挑战。四个拓展包括，第一，创新网

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建设和应用模式，拓展信息时代教育教学管理与服务方式。

第二，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互动，拓展教育信息化对教育现代化的带动作用。信息化如果不深入到教育教学，不深入到教育的方方面面，带动不了整体教育信息化的提升。第三，大力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学生信息素养，拓展师生适应信息时代需求的教学能力和创新能力。第四，加强网络安全，拓展教育改革和发展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学校要主动把教育信息化纳入规划

我们还有一些分类的目标，在省级、地市区县层面分别提出了需求，要着力加强对本地薄弱地区、薄弱学校和教学点的支持力度。地市区县层面要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信息化的管理督导，鼓励至少在地市区县层面，有整体的考虑和规划。全国有51万所学校，如果每个学校都做自己的系统，这还是教育信息化吗？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现在还有很多学校要砸几千万元买设备建机房，我们不主张这样做。学校应该通过向企业购买服务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什么都要自己做。另外，各级各类学校要主动把教育信息化

纳入本校的总体规划。现在学校肯定都在做“十三五”规划，那么，有没有单独为信息化做一个子方案，如果有，我觉得你们是跟上了时代发展，如果没有，就要注意了。东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不同，所以，东中西要有不同指导、分类指导。我们提出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省会以及中心城市，要率先实现国家规定的教育信息化发展目标，率先推动基础条件较好的各级各类学校在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深入应用，促进教育教学变革和教育管理的现代化。另外，职业教育的信息化空间也非常大。对比较发达的地区，我建议大家要开始考虑终身教育的问题。现在全国考虑到终身教育的地区还不是太多，我觉得发展水平中等偏上的省份、地市区县都应该主动考虑终身教育、全纳教育，这是社会文明程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们还有保障措施：第一，加强领导，健全规范化管理体制机制。所有的省厅都有专门的处来管教育信息化，对地市区县，我们也提同样的要求。大家知道，省厅是科技厅在管，到县教育局却没有科技处。我希望县一级的教育局，最好是基教部门来管信息化，因为县的最大体量在基教，如果把基教部门的信息化抓起来了，教育

信息化就完成了一大半。第二，整合资源，建立完善的教育信息化技术服务支撑机构。希望每个地区、每个层面都要有一些资源保障的体制机制。这很难，面临养人的问题，面临买服务的问题，预算的经费也是问题，我们一直提倡买服务，但是固定资产怎么去买服务？这些都是体制机制要理顺的问题。第三，加强督导，形成制度化的评估机制。我们现在考虑要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到督导体系，也就是说督导中一定要有信息化的指标，从而迫使所有层级的单位注意到这件事。第四，完善保障，形成多元投入的支持机制。第五，加强协作，形成优势互补的国际合作机制。第六，明确责任，确保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协调发展。

举个例子，上海市古美高级中学是上海相对比较落后的学校，只有一半左右的学生能考上一般的本科学校，这个升学率在上海是非常低的。该校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实施微课导学、翻转课堂教学，及作业辅导整体教学改革后，2014年高考本科升学率即提高了24%。在2015年闵行区质量监控中，该校物理、化学、生物三科成绩的排位，从入学时的第13位上升到第三、四位。我非常欣赏上海市古美高级中学的做法

——用比较廉价、比较简单的方式，改变了老师教学和学生做作业的常态。

“十三五”规划还有一段时间才正式实施，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十三五”期间全国教育信息化再往前推上一个新的平台。

（以上观点根据“第十五届中国

教育信息化创新与发展论坛”视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在线学习》

记者：苏群

慕课时代下教师面临的挑战与角色定位

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其速度前所未有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几乎所有领域都在忙于“互联网+”或“+互联网”，但学校似乎是个例外，特别是中小学，成为对互联网抵抗力最强的领地，坚定地防御着互联网的入侵，虽然学校原本应该是催生新技术、新思路的场所。

这确实有点意外：一方面受教者比施教者更加适应网络生活，他们对各种网络终端的使用得心应手，对网络生态适应自如；另一方面，威权俱在的施教者却没有这种优势，甚至不在少数的人对网络先天抵触，所以抗拒者绝不是学生，而可能是老师或学校。

互联网还得静待时机来打破这种力量的平衡。但这暂时的平静不会维持很久，山雨欲来风满楼。慕课(MOOC)作

为先声已经对相对沉寂的教学领域发出了第一声呐喊！

延续数百年之久的课堂授课制，因慕课出现受到冲击

慕课意指大规模的网络开放课程。它的出现为学生通过网络学习提供了可能，其基于大数据的丰富性可以满足学习者的选择性；其基于课程素材的灵活组合使课程具有无限的生成性可以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其服务和交流的交互性可以满足学习者的适时性；其基于云功能的互联性和不同终端灵活切换的互通性可以满足学习者的便捷性。

传统的班级授课制条件下，学习者最主要的需要均难以满足，包括自主性、主动性、个性和选择性，这些在慕课条件下都可以顺利解决。

不过，相较传统模式，慕课教学也逐步暴露诸多问题，比如学习过程的有效控制、学与教的个体之间的信赖感难以建立、课程的修完率不高、人格培养弱化等。

但是，世界上哪一个新生事物不是在攻坚克难中崛起的呢？有人说，教育有其特殊性，屏幕永远代替不了纸张，网络也代替不了课堂。但现实是，数字正在代替纸币，淘宝正在代替实体商店，而这仅仅在几年前似乎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以下关于英、美历史上人们对于学习工具变化的评论读来很有意思，也许会给我们更多启示。（注：括号标注的是当时发表评论的组织或个人。）

今天的学生不能用树皮来进行计算，只能依赖价格昂贵的石板。如果他们的石板打碎了，他们就什么也不会写了。（教师大会，1703年）

今天的学生只能在纸上计算，不会很好地使用石板。当他们把纸用光了，真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校长协会，1815年）

今天的学生太依赖墨水了，他们甚至不知道怎么用铅笔刀削铅笔，墨水永远也代替不了铅笔。（国家教师协会，1907年）

圆珠笔会毁了教育，学生用这些东西，然后随意抛掉，美国人勤俭节约的品质完全被忽视了。（联邦教师，1950年）

.....

无论你我是否愿意，网络也许都会对传统教学方式——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课堂授课制产生冲击，很可能是一场摧枯拉朽式的变革。

教师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才危机”已经来临

这一变革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将直接施加在教师身上。

首先，教师将遭遇教学技能危机。在线教学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课堂教学，这就会引起课堂教学方式的深刻变化，所以就有了“翻转课堂”一说。它使教师面临传统教学技能的筛汰，一些习以为常的教学技能将被弱化甚至淘汰，一些会得以保留甚至强化。而一些新技能将会得到重建，比如网络课件的制作，课程的量身定做，在线服务，主流网络终端的使用，灵活获取准确资源等。

其次，教师将面对信赖危机。教育的核心是信赖，所谓亲其师信其道。在班级授课制下，教师和学生，是真人同一场所下的教与学，教师的言行举

止会产生表率作用，形成对学生的人格影响，逐步培育起学生对老师的信赖，这将成为学生成长阶段的重要教育力量。在网络条件下，冷冰冰的屏幕将人格影响降到最低，信赖无从谈起。特别是，教师的教学对象从确定变为隐匿，使得人格培养教育的过程不可控制、目标难以预测。

再次，教师可能将面临职位危机。互联网会放大一切，可以把原本几十个学生享受的优质师资推送到千家万户，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教师资源过剩。一方面线下教学面临着在线教学的争霸，使坚守传统阵地的教师面临教学对象的直接或潜在的流失，造成职位危机；另一方面，线上教师因为受众的选择也会出现巨大的修课人数的差异，同样对那些不适合在线教学的教师由于学生稀少而面临职位危机。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教师可能恰恰是传统教学中那些具有中等才能的群体——也是最大的群体，对需要更低才能的岗位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对此，有人形象称之为“中才危机”。

教学变革当前教师定位首先要发生转变

慕课时代下教师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呢？所谓危与机并存，不惧挑战主

动直面危机的教师将会是未来的赢家。

这就要求教师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习得与时俱进的教学技能。在研制教学课件中关注自己的外表，包括衣着甚至发型，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表现出良好的气质，培养自己语言表现力、环境适应力、展示或表演力。教师要熟悉多种网络终端的使用，熟悉知识、素材的获取通道，用良好优雅的形象给学生以人格感染力，用严谨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生动有效的课程内容抓住学生的心，培养屏幕前每一个听课者的信赖感。

总体上，教师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给自己的角色定位——

变本位捍卫者为开疆拓土者。这是自我认知上的变革。传统模式下，教师拥有“三尺讲台”就可以包打天下，因为这“三尺讲台”是学校给的，台下之人没有选择权利。而在慕课的条件下就不一样了，需要教师在网络上用自己的课程开疆拓土，去赢得属于自己的“王国”。

变素材搜集者为规划设计者。这是课程设计和实施上的变革。在传统模式下，除了教材，教师主要是搜集素材，为课堂教学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但慕课条件下，学生通常是通过线上学习，然后带着问题回到教室参与交流讨论，

即所谓的“翻转课堂”，所以，需要施教者为学生课内课外、线上线下的学习做好完整规划和安排。

变知识宣讲者为智慧对话者。这是教学理念的变革。传统教学以老师讲学生听为主要模式，教师以知识传授者自居；在“翻转课堂”中，教师主要是引导者、启发者、参与者，以开启学生智慧为己任。

变技能训练者为理性助产者。这是教学方式上的变革。传统教学方式带有强烈的应试烙印，强调技能训练，追求教学效果，只关心考的好不好；在“翻转课堂”中，学习者课前已经通过网络慕课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学习，教师只需通过组织并引导学习者相互交流、对话、反思甚至答辩，使学生的认知结构进一步完善，心智不断发展。也许这才是回归教学的本真生态！

变方法提炼者为形式独创者。这是教学特色上的变革。为了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或教学风格，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通常要做一个方法提炼者，并逐步兼容并蓄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但这是立足于课堂的而且落实在施教者自身的；慕课条件下，教师更应该从创设学习者的形式上入手来构建自己独特的教学个

性特色。例如，台湾大学的叶丙成教授，把游戏引进大学数学学习，其基本操作方法是，给每一个学生在游戏屏幕上划定一块领地建立自己的“王国”，每做好随机产生的一道高等数学题就可以扩大领地，选择较高难度的问题可以获得领地相对也更大，还可以像围棋一样用挣来的领地去包围并吃掉对方的领地以扩大自己的“王国”。这一学习方式备受学生欢迎，一些不爱学习爱游戏的学生变成了解题高手，甚至作为参与者之一，老师自己也因学生的不断包抄最终散尽领地而“亡国”。进一步实施过程中，好胜心促使一些学生结盟，老师发现后及时更改游戏规则，引进个人或团队数学竞赛，使参与课程学习的学生扩展到校外，甚至走向国际。

上海市教委日前发布了全国第一个“高中名校慕课平台”，在线教学渐行渐近。当这场教学变革成为席卷全人类的风暴时，我们要么成为高尔基笔下的海燕，要么成为其笔下的企鹅，这是不二的选择。

来源：《文汇报》

作者：张雪明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数学特级教师

■ 北大人物

倪晋仁：聚沙成学科之塔 滴水穿攻坚之石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开展环境教育和研究的大学之一，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肩负着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建设的重任。北京大学的环境工程学科 20 年来一路艰辛走来，目前已发展形成一支朝气蓬勃队伍，而这离不开一位学科带头人多年身体力行的无悔付出，他就是北京大学环境工程学科的创办者、现任北京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倪晋仁院士。



倪晋仁近影

白手起家 信念支撑理念

“当年不仅软硬件都跟不上，就连北京大学是否应该发展环境工程学科在认识上也有很大分歧。”倪晋仁说起 1995 年组建环境工程研究所的经历，至今感叹不已。在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王

义道等校领导的支持下，环境工程研究所得以在城市与环境学院成立，但随之而来的是平台搭建所面临的办公空间、人员编制、研究生、仪器设备、资金等一系列问题。办公室、实验室、仪器设备都需要自己筹钱租用，往往是依靠横向项目完成后的结余款支付；人员费以及研究生培养费、生活费、医疗费与住宿费都需要自筹资金解决等。“我们可能是在学校最早招生计划外研究生的。”倪晋仁坦言，“上世纪 90 年代的环境工程学科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能给我们这块牌子已经非常感激，拓垦开荒虽然艰苦，但是我们对未来一直充满希望。”

在环境工程研究所成长的“生存”阶段，倪晋仁不懈地探索着环境工程的出路，同时也常年为研究所的“生计”而奔波。当得知教育部建立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以及国家“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985 工程）”消息后，倪晋仁预感学科整合的最佳时机到来了，他随即向时任常务副校长迟惠生等校领导汇报了将环境工程研究所并入环

境科学中心的想法，得到了校领导与唐孝炎院士的积极支持，也迎来了环境工程学科的“建设”阶段。“2000年，北京大学成为首批获得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单位。借助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的整合优势，环境工程学科博士点顺利建立。”

倪晋仁谈起这个时期的苦乐：“自己本来是研究水利工程的，轻车熟路，顺风顺水，但偏偏对自己并不熟悉的环境工程产生了兴趣，从此走上了一条艰难的创业之路，几乎将过去的优势清零。”事实上，他在1992年就被北京大学破格聘为教授，同年获得钱宁泥沙科学奖，1994年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首届全国博士后十佳（国氏）奖、国家优秀中青年人才专项基金，1996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997年他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江河泥沙灾害形成机理及其防治研究”，那年他35岁。面对学科方向的重大转变，他说：“从零开始学习、摸索、实践，虽然疲于奔命，但也乐于通过不断的尝试来探寻北大环境工程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从无到有，从有到精。学院的这十年“建设”期，倪晋仁教授一手组建了教育部水沙科学重点实验室（2000）、环境学院环境工程系（2002）、环境工

程实验室（2004），启动了深圳研究生院环境工程专业学科建设（2004），倡议并组建了国立新加坡大学-北京大学-牛津大学（SP0）水与环境技术平台（2010），十几年间吸引并网罗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

有了较为扎实的学科地位和学术成果之后，倪晋仁思考的更多是：怎么形成并发挥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学院发展的软实力首要靠优质人才，到了发展期，我们开始有计划地引进更多的、代表学科发展新方向的教师，也同时注重学院自身对人才的培养。”2012年倪晋仁组织建立了北京市新型污水深度处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他眼中，环境工程的学科价值在于对于现实世界“创新”“有益”，力求将学科的先进性、实用性、前瞻性扎实落地。20余年来，倪晋仁坚守北京大学环境工程学科建设的岗位，令他欣慰的是，北京大学环境工程学科研究团队目前已经有实力针对中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些重大环境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

钟情所学 致力碧水青山

2015年，倪晋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5年年初，世界著名出版公司爱思唯尔（Elsevier）在其官方网站上发

布了 2014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共涵盖 38 个学科类别，倪晋仁位列环境科学学科类别。

抛开外界的赞誉与认可，倪晋仁说起自己的求学之路和科研经历，单凭“喜好”二字。“环境研究对人类有积极正面的意义，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本身就是快乐的。”甚至在忆起环境工程研究所初创时的清贫年头，大小繁杂事务都要亲力亲为，为计划外研究生到处寻找出租的平房时，他也笑着表示，“回想起来也挺有趣的”。

谈起他钟情的事业，倪晋仁总能滔滔不绝地打开话匣。“环境学科本就是一个交叉的、新兴的学科，它敞开怀抱欢迎一切有志于从事研究的人。”而谈及“碧水青山”的发展要求下，环境研究者的学科使命感，他则直言不讳地指出“首先要具备研究能力，其次再谈使命感，否则都是空谈。”当前国家部分地区“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对环境工程学科的发展施加了不小的压力，对此倪晋仁指出：“环境学科的前瞻性就在于，该优先做的是‘保健医生’的工作，而不是‘急诊室、抢救室’的紧张应急，谈环境问题一定要从长远视角出发。”

秉承着这样的理念与热情，倪晋仁致力于水沙科学与环境工程交叉的跨学科研究，迄今已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200 余篇，出版学科专著 5 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0 余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欧盟国际合作项目、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国际合作项目、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等 30 余项重要的项目，领衔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指导数十名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

多项国际学术认可、国家级荣誉的背后，这位来自三晋大地的学者，用玄武恒山一般不事雕琢却又坚韧不屈的品格诠释着“钟情所学”，讲台上、河湖边常见他无悔耕耘的身影，这份坚守也传承于他所培育学生之中。



倪晋仁和学生外出考察河流

我心匪石 莫若苍苍之竹

学生眼中的倪晋仁老师是严谨朴实的代名词。加入倪晋仁研究组三年多的博士生龙玉娇用“竹子”来形容导师给人的一以贯之的印象。“生活中的倪老师是个简朴而自信的人。”龙玉娇讲起了平日的细节，“记忆特深刻的是一次随倪老师去国外开会，他穿了件左手臂破洞的西服，说那件西服都穿了十几年了，他认为衣着干净整洁就行，穿着破了衣服开会并不丢人，并认为人自信了穿什么都自信。”几位硕士同学也透露：“平常跟老师去食堂吃饭，他总是向我们提倡光盘，每次自己也都照做。”

当提及北京大学环境工程系，2013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朱秀萍博士对恩师及学院表达了深深的敬佩：“无论研究条件还是仪器设备，抑或是师资力量，系里都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持。研究组对我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的，譬如对科研的兴趣和执着，倪老师会给我们很多言传身教的指引。”

“北大学生往往嘴上说的多而手上做得少，希望你能做扎实的事。”2012级本科生王祖辉讲起毕业论文选题时倪老师曾勉励他的一句话，“觉得很受触动，老师也让我给环境工程的本科生培养提些建议，我从本科生的视角分享了很多想法，也是出于对学院老师辛勤培育的感恩”。

身边学子对导师的推崇与敬佩，研究团队对学科的热忱与激情，不仅是学院未来的发展助力，更为世界一流学科的“引领”作用强化了核心竞争力。聚沙成塔，滴水穿石，倪晋仁所耕耘的这方天地，必将成为武陵渔人所见的那片“桃花源”。（文/校报记者 马昕琳）

来源：北大新闻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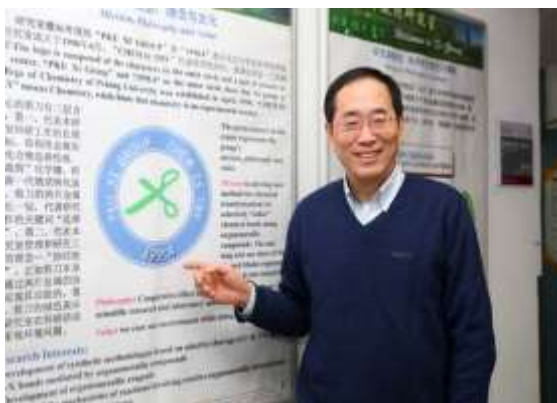
编辑：拉丁

席振峰：等闲识得燕归来

【人物简介】席振峰，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人，1963年生，现为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江学者、院士。主要研究方向是利用金属有机化合物研究高选择性有机合成新反应、新方法，深入研究活性金属有

机中间体和反应机理，追求的长期目标是发现金属促进的化学键的选择性切断与重组反应规律，探索新一代物质转化的途径。提出并坚持以“协同效应”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研究思路，在双金属有机合成试剂的发现与发展、路易斯酸促进的金属有机化学反应，以及金属活性中心与有机配体或者底物的“协同效应”方面努力开展了工作。2015年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席振峰近影

2015年12月7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2015年新入选院士名单，北京大学共有六位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来自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有机化学专业的席振峰教授，就是这六位教授中的一员。从协同效应到化学键的活化与切断，席振峰将自己的专业领域与研究成果，向记者娓娓道来。

负笈东瀛：积累深入亦创新

1993-1998年，席振峰先后是日本分子科学研究所高桥保教授课题组功能分子科学专业博士生，日本北海道大学催化研究中心高桥保教授课题组博士后，并于1997年成为北海道大学药学部助理教授。

回想起在日本的岁月，席振峰表示，日本很多老一辈科学家最值得学习的一点在于：很少有人为研究而研究。“2010年北海道大学铃木章教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获奖的时候人家问他你怎么知道你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他说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这个问题，只是觉得当时很少有人开展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后来才发现这个东西很有用。”说到这里，席振峰淡淡一笑，没有功利心的研究，恰恰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说到中国与日本学术的差别，席振峰举了个小例子。“我在日本当学生的时候，感受最多的一点，日本学生也非常关注论文，他们也会讨论隔壁实验室发了什么论文，讨论论文中研究了什么事情，科学的贡献在哪里。而咱们的许多学生更关注别人的论文发表在什么地方，并不太关注论文本身讲什么；日本学术界关注论文的科学研究内容和文章质量。日本近年来多次获得诺贝尔奖，

这得益于几十年来日本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积累。”

席振峰介绍道：“在日本更多的是把一个事情做得很深入，教授退了常常由课题组的副教授接任，这点跟美国不一样，在日本科研延续性很强。创新也是这样，慢慢积累与深入也是一种创新。”

协同效应：二月春风似剪刀

“我们实验室的 LOGO 很特别，其核心是一把剪刀。理解了 this LOGO，就能理解我们的研究工作。”在谈及所研究领域时，席振峰向记者展示了实验室的徽标。

据介绍，徽标外围的“PKU XI GROUP”和“1998.4”表示席振峰研究室成立于1998年4月。“CHEM IS TRY”代表化学的同时，强调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中心的剪刀有三层含义：第一，代表研究室工作的长期目标，即利用金属有机化合物选择性地“裁剪”化学键，研究新一代物质转化途径，剪刀的两片金属一长一短，代表研究工作的关键词“选择性”；第二，代表本研究室管理和研究工作的理念：“协同效应”，正如剪刀本身是通过两片金属的协同实现其功能的；第三，剪刀的绿色表示本研究室在科研活动中重视环境问题。

那么该如何理解协同效应的具体内涵呢？“金属有机化合物在合成化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早是作为试剂，后来是作为催化剂。”席振峰介绍得谦逊低调，“几次诺贝尔奖获奖者都将其用作催化剂做了药物或者材料，我做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是强调协同效应，是两个金属在一个分子里面。比如，螃蟹的两个钳子，拆掉一个不会起到作用。但是，两个金属在一个分子里面，反应就跟单个金属反应不一样。”

作为一项基础研究，席振峰所研究的“选择性切断非活性化学键”不易被理解，“随着自然资源的日渐贫乏，人类社会对便宜易得的生活和生产原料将增大需求。选择性‘剪裁’化学键，可以降解人为生成的环境有害物质，还可以作为新的合成前体化合物被重新利用，意义就非同小可。”早在2006年的《光明日报》就是这样解读席振峰研究组从事的“金属有机化学”研究。

教学相长：协同惜缘“深新信”

任何人，要做成一项事业，没有团队、没有良好的环境都是很难办到的，协同效应是席振峰团队核心理念。

“我研究的是双金属试剂，最重要的就是协同效应，人与人之间也离不开

协同效应。北大的学生都很优秀，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么就需要引导和创造适合他们发挥的条件。”1998年席振峰回国，实验室成立之初研究生少，本科生多，实验室管理上面临一定挑战，“我采用学生自治的方法，大家互相支持，每个人各有分工，如有的人管财务，有的人负责外联。设研究生总管，其主要目的是负责实验室安全，及时发现安全隐患。”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出色的个体，却由于“协同效应”聚合在一起发出了团队璀璨的光芒。

席振峰坦言，教学相长的过程中，除了协同合作，更要珍惜师生彼此间的缘分。“缘分很重要。世界那么多人，能把我们聚在一个实验室的是缘分，这段时光很值得珍惜，大家需要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支持。”教学者需要常怀一颗因材施教之心，这也是席振峰的教学理念之一，“每一个同学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比如有的人看谱图很厉害，有的人理论分析很强，有的人实验技术动手能力很强。老师只能给大的方向，而同学之间互相学习、日常讨论和互相帮助更为重要。”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席振峰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个人的修行

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是否拥有持之以恒的态度和浓厚的兴趣。“北大的学生天赋都很好，所以未来脱颖而出的还是靠努力，最重要的是态度。天赋和努力是两码事，态度不一样，体现出来的精神就不一样，所以科研中最可贵的就是扎实踏实、心无旁骛，坚持在科研中是尤为珍贵的品质，甚至远胜于天赋。

“其实北大和其他学校学生之间差距不大，关键在于有没有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努力是另外一件事情。一个人有兴趣的话，就会努力去做一件事情。以我们的学生看，努力程度决定了一个学生是否能做到最好。”为了贯彻学术的兴趣及追求，席振峰也坚守着对教书育人的执着，“我个人坚决反对学生称呼为老板，学生见了我就喊老师。”

“我们老师能做的，就是给学生尽可能提供好的学习和科研条件，在大的方向上给予指导，为学生将来的发展而考虑。”席振峰语重心长，教书育人的责任比之科研创新，同样任重道远。因此，他提出了“深新信”三条原则：深即深入，新即创新，信是客观的可信度和主观上的信心。一方面，由深入才能走向新和信，只有深入地进行研究和实验，才能有新发现和可信的结果结论，

同时也能给自己增添信心。另一方面，从信心推出创新和深度，没有信心难以创新，更很难有深度。如果没有信心，则十有八九做不成。

院士之名：无心插柳柳成荫

关于院士，席振峰并没有特殊的感受。

“首先感谢北大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北大对待学术的宽松与自由是较少见的。”席振峰谈道，“同时还要感谢这个时代做出的选择。对于这份荣誉，我会努力地去做好本职工作，在教学上始终兢兢业业保持谨慎之心。”

“科研中做什么事情做了什么选择，就努力地去。成为院士并不是计划当中的事情，创新和脚踏实地才是头等大事。”席振峰深深沉浸在化学研究所带来的喜悦中，而这样一种踏实勤恳的心态，也已在岁月的洗炼之后内化为一种他身上淡定从容的气度。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句话用来形容席振峰本人再合适不过。智商情商双高的他，可以用英文做漂亮的 presentation，也可以用日语流利地与

日本学者交流；能耐心细致地指导学生攻克学习和研究中的难题，也能深入浅出地向门外汉科普至艰至深的研究成果。十七年如一日，他在北大这个国际化的学术平台上自由地实现自己的学术追求。

等闲识得燕归来，“协同效应”之于席振峰，与其说是一把剪刀，不如说是春风里双飞双宿的燕尾，双尾迎着春风一剪，剪出新一代物质的转化途径，剪出席组成员合作的亲密默契。“协同效应”这把燕尾在日积月累的浸润中迸发灵感，也在千锤万炼中成就突破，协同席振峰研究室、协同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协同北大，一起走过了十七年满心感恩的岁月……(校报记者 杨镛霏)

来源：北大青年

编辑：拉丁

学者谈读书

为什么读经典

让我们先提出一些定义。

一、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至少对“博学”的人是如此；它不适于年轻人，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年龄：他们接触世界和接触作为世界的一部分的经典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这是他们初次接触。

代表反复的“重”，放在动词“读”之前，对某些耻于承认未读过某些名著的人来说，可能代表着一种小小的虚伪。为了让这些人放心，只需要指出这点就够了，也即无论一个人在性格形成期阅读范围多么广泛，总还会有众多重要的作品未读。

任何人如果读过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全部作品，请举手。圣西门又如何？还有雷斯枢机主教呢？即使是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系列小说，通常也是提及多余读过。

在法国，他们在学校里开始读巴尔扎克，而从各种版本销量来判断，人们

显然在学生时代结束很久之后还在读他。但是，如果在意大利队巴尔扎克的受欢迎程度做一次正式调查，他的排名恐怕会很低。

狄更斯在意大利的崇拜者是一小撮精英，他们一见面就开始回忆各种人物和片段，仿佛在谈论他们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

米歇尔·布托尔多年前在美国教书时，人们老是向他问起左拉，令他烦不胜烦，因为他从未读过左拉，于是他下决心读整个《卢贡-马加尔家族》系列。他发现，它与他想象中完全是两码事——“它竟是庞杂的神话系谱学和天体演化学。后来他曾在一篇精彩的文章中描述这个体系。

上述例子表明，一个人在完全成年时首次读一部伟大作品，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种乐趣跟青少年时代非常不同（至于是否有更大乐趣则很难说）。在青少年时代，每一次阅读跟每一次经验一样，都会产生独特的韵味和意义；而在成熟的年龄，一个人会欣赏（或者说

应该欣赏)更多的细节、层次和含义。因此我们不妨尝试以其他方式表述我们的定义:

二、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来说,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

因为实际情况是,我们年轻时所读的东西,往往价值不大,这又是因为我们没耐心,精神不能集中、缺乏阅读技能,或者因为我们缺乏人生经验。

这种青少年的阅读,可能(也许同时)具有形成性格的实际作用,原因是它们赋予我们未来的经验一种形式或形状,为这些经验提供模式,提供处理这些经验的手段,比较的措辞,把这些经验归类的方法,价值的衡量标准,美的范式这一切都继续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哪怕我们已经差不多忘记火完全忘记我们年轻时所读的那本书。

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我们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衡定事物,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来它们从哪里来。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可以给出这样的定义:

三、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他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想象力打下印迹,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基于这个理由一个人的成年生活应有一段时间用于重新发现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作品。即使这些书依然如故(其实它们也随着历史视角的转换而改变),我们也肯定改变了,因此后来的这次接触也就是全新的。

所以,我们用动词“读”或动词“重读”也就不真的那么重要。事实上我们可以说:

四、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五、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好像是在重温的书。

上述第四个定义可以视为如下定义的必然结果:

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悔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而第五个定义则隐含如下更复杂的表述:

七、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

这同时适用于古代和现代经典。如

果我读《奥维德》，我是在读荷马的文本，但那我也不能忘记奥德修斯的离线在多少世纪以来所意味的一切，而我不能不怀疑这些意味究竟是隐含于原著文本中，还是后来逐渐增添、变形或扩充的。

如果我读卡夫卡，我就会一边认可一边抗拒“卡夫卡式的”这个形容词的合法性，因为我们老是听见他被用于指谓可以说任何事情。

如果我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我就不能不思索这些书中的人物是如何一路转世投胎，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读一部经典作品也一定令我们感到意外——当我们拿它与我们以前所想象的它相比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一再推荐第一手文本，而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

中学和大学都应加强这样一个理念，即任何讨论另一本书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然而学校却倾尽全力要让学生相信恰恰相反的事情。这里广泛存在着一种价值逆转，它意味着导言、批评资料和书目像烟幕那样，被用来遮蔽文本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必须说和只能说的东西——而中间人总是宣

称他们知道得比文本自身还多，因此我们可以这样下结论：

八、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

一部经典作品不一定要教导我们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在一部经典作品中发现我们已经知道或总以为我们已知道的东西，却没有料到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是那个经典文本首先说出来的（或者那个想法与那个文本有一种特殊联系）。

这种发现同时也是一种非常令人满足的意外。例如当我们弄清楚一个想法的来源，或它与某个文本的联系，或谁先说了，我们总有这种感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定义：

九、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

当然，发生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一部经典的文本“起到”一部经典作品的作用，即是说，它与读者建立一种个人关系。

如果没有火花，这种做法就没有意义：出于职责或敬意读经典作品是没有作用的，我们只应仅仅因为喜爱而读它们。

除了在学校：无论你愿不愿意，学校都要教你读一些经典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火通过把它们作为一个基准），你将辨别“你的”经典作品。学校有责任向你提供这些工具，是你可以作为你自己的决定；但是，只有那些你在学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选择的东西才有价值。

只有在非强制的阅读中，你才回碰到将成为“你的”书的书。我认识一位出色的艺术史专家，一个极其博识的人，在他读过的左右著作中，他最喜欢《匹克威克外传》，他在任何讨论中，都会引用狄更斯这本书的片段，并把他生命中每一个事件与皮克威克的生平联系起来。渐渐地，他本人、宇宙及其基本原理，都在一种完全认同的过程中，以《匹克威克外传》的面目诚信啊。

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就会形成对一部经典作品的想法，它既令人仰止又要求极高：

十、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

这样一个定义，使我们进一步接近关于那本无所不包的书的想法，马拉梦寐以求的那种书。但是一部经典作品也同样可以建立一种不是认同而是反对或对立的强有力关系。

卢梭的所有思想和行动对我来说都十分亲切，但它们在我身上催发一种要抗拒他、要批评，要与他辩论的无可抑制的迫切感。

当然，这跟我觉得他的人格与我的行情难以相容这一事实有关，但是，如果这么简单的话，那么我不去读他就行了；事实是，我不能不把他看成我的作者之一。所以我要说：

十一、“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不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

我相信我不需要为使用“经典”这个名称辩解，我这里不按照古老性、风格或权威性来区分。（关于这个名称的上述种种意义的历史，佛朗哥·福尔蒂尼伪《埃伊纳乌迪百科全书》第三册撰写的“经典”条目由极详尽的阐述。）

基于我这个看法，一部经典作品的特别之处，也许仅仅是我们从一部在文化延续性中有自己位置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作品那里所感到的某种共鸣。我们可以说：

十二、一部经典作品是一部早于其他经典作品的作品；但是那些先度过其他经典作品的人，一下子就认出它在众多经典作品中的系谱的位置。

至此，我再也不能搁置一个关键问题，也即如何看待阅读经典与阅读其他一切不是经典的文本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与其他问题有关，诸如：“为什么读经典，而不是读那些使我们对自已的时代有更深了解的作品？”和“我们哪里有时间和闲情去读经典？我们已被有关现在的各类印刷品的洪水淹没了。”

当然，可以假设也许存在着那种幸运的读者，他或她可以把生命中的“阅读时间”专诚献给卢克莱修、琉善、蒙田、伊拉斯谟、克维多、马洛、《方法谈》、歌德的《威廉·麦斯特》、柯勒律治、罗斯金、普鲁斯特和瓦莱里。偶尔涉猎一下紫式部或冰岛萨迦。

再假设这个人可以读上述一切而不必写最新再版书的评论，为取得大学教席而投稿，或在最后期限极简届满时给出版商寄去作品。

如果保持这种状态而不必受任何污染，那么这个幸运者可以避免读报纸，也绝不必操心最新的长篇小说或最近的社会学调查。但是，这种严格有多大的合理性或有多大功用，尚未得知。

当代世界也许是平庸和愚蠢的，但他永远是一个脉络，我们必须置身其中，才能够顾后或瞻前。

阅读经典作品，你就得确定自己是从哪一个“位置”阅读的。否则无论是读者或文本都会很容易漂进无始无终的迷雾里。因此，我们可以说，从阅读经典中获取最大益处的人，往往是那种善于交替阅读经典和大量标准化的当代材料的人。

而这并不一定要预先假定某个人拥有和谐的内心平静：它也可能是某种不耐烦的、神经兮兮的性情的结果，某个永远都感到恼怒和不满足的人的结果。

大概最理想的办法，是把现在当作我们窗外的噪音来听，提醒我们外面的交通阻塞和天气变化，而我们则继续追随经典作品的话语，它明白而清晰地回响在我们的房间里。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把经典作品当作房间外远方的回声来聆听已是一种成就，因为他们的房间里被现在弥漫着，仿佛是一部开着最大音量的电视机。因此我们应加上：

十三、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他把现在的噪音调成一种背景轻音，而这种背景轻音对经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

十四、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哪怕与它格格不入的现在占统治地位，它也坚持至少成为一种背景噪音。

事实仍然是，读经典作品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步调不一致，我们的生活步调无法忍受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给人本主义者那种庄重的悠闲；也与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不一致，这种精英主义永远也制定不出一份经典作品的目录来配合我们的时代。

这反而恰恰是莱奥帕尔迪的生活环境：住在父亲的城堡（他的“父亲的家”），他得以利用父亲莫纳尔多那个令人生畏的藏书室，实行他对希腊和拉丁古籍的崇拜，并给藏书室增添了到那时为止全部意大利文学，以及所有法国文学——除了长篇小说和最新出版的作品，它们数量极少，完全是为了让妹妹消遣（“你的司汤达”是他跟保利娜谈起这位法国小说家时的用语）。莱奥帕尔迪甚至为了满足他对科学和历史著作的极端热情，而捧读绝不算“最新”的著作。读布封关于鸟类习性的著作，读丰特奈尔关于弗雷德里克·勒伊斯的木乃伊的著作，以及罗伯逊关于哥伦布的旅行的著作。

今天，像青年莱奥帕尔迪那样接受古典作品的熏陶已难以想象，尤其是他父亲莫纳尔多伯爵那样的藏书室已经解体。说解体，既是指那些古书已所剩无几，也指所有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新著作

大量涌现。

现在可以做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明我们自己理想的经典藏书室；而我想说，其中一半应该包括我们读过并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另一半应该是我们打算读并假设可能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我们还应该把一部分空间让给意外之书和偶然发现之书。

我注意到，莱奥帕尔迪是我提到的唯一来自意大利文学的名字。这正是那个藏书室解体的结果。现在我应重写整篇文章，以清楚地表明，经典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和我们所到达的位置，进而表明意大利经典对我们意大利人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我们就无从比较外国的经典；同样地，外国经典也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我们就无从衡量意大利的经典。

接着，我还真的应该第三次重写这篇文章，免得人们相信之所以一定要读经典是因为他们有某种用途。

唯一可以列举出来他们欢心的理由是，读经典总比不读好。

如果有谁反对说，它们不值得那么费劲，我想援引乔兰（不是一位经典作家，至少还不是一位经典作家，却是一个现在才被译成意大利文的当代思想家）：

“当毒药在准备中的时候，苏格拉底正在用长笛练习一首曲子。‘这有什么用呢？’有人问他，‘至少我死之前可以学习这首曲子。’”

作者：卡尔维诺

译者：黄灿然

编辑：丁香的耳朵

叔本华：比读书更重要的是什么？

不管任何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假如不加整顿杂乱无章的话，它给予我们的利益还不如那些规模小藏书少，但整理得条理井然、分类清楚的图书馆，同理，不管你学识如何的渊博，如若不能反复思维咀嚼消化的话，它的价值，远逊于那些所知不多但能予以深思熟虑的知识。

何以言之？

因为我们若要将所学得的知识消化吸收，变为己有，并且能够充分应用发挥的话，就必须经过思考的过程，把自己的知识在诸方面相结合，或是把你的真理和其他的真理互相比较。

当然，我们所能“深思熟虑”的东西，范围狭窄得很，它只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求上进，不断地学习。

读书或学习，我们可以随心之所欲，爱读什么就读什么，爱学什么就学什么，

但这里的所谓“思考”，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它像在风中煽火一般，必须始终不断地煽动，才能维持火焰不熄；思考时，必须要对思考的对象发生“兴趣”，不断地刺激它，并且要持之久远不可懈怠。

思考兴趣发生的原因可分为两类：

一是纯粹客观性的；二是主观性的。

后者是在有关自我的事件时引发了思考的兴趣；前者是对宇宙万物发生兴趣，这一类人之所以思考，就如同我们的呼吸一般，纯属生理的自然现象，当然，这类人并不多见，连一般的所谓学者，真正在思考的，为数也少得可怜。

思考和读书在精神上的作用，可说是大异其趣，其距离之大，恐令人难以置信。本来人类的头脑就有着个别的差异，有的人喜爱读书，有的人迷于沉思，再加上前述的距离，使得这原有的差异，越发扩大起来。

读书的时候，精神的一切活动全为书本所支配，随书本之喜而喜，随书本之忧而忧，此正如把印章盖在封蜡上一样，其喜怒哀乐的情绪，原不属于自己的精神所有。

思考时则不然，在思考的瞬间，精神和外界完全隔绝，随着自己的思考而活动，它不像读书，被别人特定的思想所控制，而是按照当事者的禀性和当时的心情，供应一些资料和情绪而已。

所以，一天到晚沉浸于书中的人，他的精神弹力便要消失殆尽了，这就和长时期被重物所压的弹簧一般、它的弹力必定会消失的。你如果想做个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的动物，去当个“蛀书虫”确是不二法门。

大概说来，一般“博闻多识”的人，大半都无较佳的才慧，他们的著作所以不能成功的道理，正是因为一味死读的关系。

这类人正如波普所云：“只是想做个读者，不想当作者。”

所谓“学者”是指那些成天研究书本的人；思想家、发明家、天才以及其他人类的“恩人”，则是直接去读“宇宙万物”。

严格说来，有他本身根本思想的人，才有真理和生命，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有对自己的根本思想，才能真正彻底的理解，从书中阅读别人的思想，只是捡拾他人的牙慧或残渣而已。

经阅读后所了解的思想，好像考古学家从化石来推断上古植物一样，是各凭所据；从自己心中所涌出的思想，则犹似面对着盛开的花朵来研究植物一般，科学而客观。

读书不过是自己思考的代用物而已。

我们只可以把书本当做“引绳”，阅读时依赖他人把自己的思想导向某方面。但话说回来，有很多书籍非但无益，而且还会引导我们走向邪路，如果轻易被它们诱惑的话，我们势必陷入深渊歧途不可。

所以，我们心中要有个“守护神”，靠他来指示迷津，引向正道。这个守护神，只有能够正确思考的人才为之。

就是说，唯有能自由而正当思索的人，才可发现精神上的康庄大道。

所以，我们最好在思想的源泉停滞之时，才去读书。思想源流的停滞，连最好的头脑也经常有此现象。不如此，而手不释卷地孜孜勤读，把自己的思想放逐到僻静的角落，这对思想的圣灵实是罪过。

这类人正如一些不得要领的学画者，成天看着于枯的植物标本，或铜版雕刻的风景，而把大自然的景物置于脑后一样。

思考的人往往会发现一种现象：他搜索枯肠，绞尽脑汁，经长时间研究所获得的真理或见解，闲来不经意地翻开书本来，原来这些论调，别人早已发掘到了。

泄气？失望？

大可不必。

这个真理或见解是经过你自己的思考而获得的，其价值自非寻常可比。惟是如此，才更能证明该种真理或见解的正确性，它的理论才更能为大众所理解所接受，如是，你成了该真理的一员生力军，这个真理也成了人类思想体系的一支。

并且，它不像一般读来的理论，只是浮光掠影而已，它在你的脑海中已根深蒂固，永远不会消逝。

自己思索的人，他的意见以后可能被举为权威的例证。这时候的“权威”和一般书籍哲学家所据以为“权威”的情形不同。前者的意见和他自身有着强而有力的连结；后者不过是搜集整理归纳别人的意见。

它就好像是用些不知名的材料所做成的自动木偶一样，而前者与之相比，则是个活脱脱的生人，因为它是从外界在“思考之心”中植下胚胎，经过受胎、妊娠、分娩等过程而产生出来的。

靠着学习得来的真理，就好像义手、义脚、义齿或蜡制鼻子及利用皮肤移植术等，附着在身体的器官一样也许还不如它们来得逼真。

而自己所思索得来的真理，则好像自然的身体四肢，确确实实属于自己所有。哲学家和一般学者的最大分野在此。

由是之故，他们在精神上的收获也大异其趣。哲学家有如一个画师以正确的光影、适当的比例、调和的色彩，画出一幅动人的杰作。

而学者呢？他只是把各种色料加以系统的排列而已，它酷似一个大的调色板，既无变化也不调和，更没有丝毫意味。

读书是意味着，利用别人的头脑来取代自己的头脑。自己思考出来的东西，尽管它不见得是严密紧凑，但总是有个脉络可寻的总体，我们可赖它向某种体系开展，比起看书吸收他人的思想，可说是利多害少。

为什么呢？

因为后者的思想是从各种形形色色的精神而得来，属于别人的体系，别人的色彩。它不能像自己思考的人，已把自己的知识、个性、见解等融合成一个总体、他的脑子里三教九流，诸子百家的思想纷然杂陈，显得混乱不堪，这种思想的过度拥挤状态，攫夺了一个人的正确观察力，也使人失去主见，并且很可能导致精神秩序的紊乱，这种现象，我们几乎在所有的学者身上都可发现。

所以，在健全的理解力和正当的批判力等方面来说，这类人远不如那些所学无几的人。

以读书终其一生的人，他的知识完全是从书本汲取而得，他们有如阅读了许多山水、游记之类的书籍，对于某地或某国的有关知识虽可粗枝大叶地说出来，但是甲地和乙地是如何地联络？人

文、物产、习俗又是如何等等，则说不上来。

反之，以思考终其一生的人，就像土生土长的父老，一打开话匣子便能把本地事事物物的来龙去脉，以及各种事实或传说和事物的总体关系等，如数家珍般地道出来。

来源：《悲喜人生》

作者：叔本华

好文共赏

季羨林自传（上）

我于一九一一年八月六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官庄。我们家大概也小康过。可是到了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形同贫农。父亲亲兄弟三人，无怙无恃，孤苦伶仃，一个送了人，剩下的两个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饿得到枣林里去拣落到地上的干枣来吃。

六岁以前，我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我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大概只不过几个字罢了。六岁离家，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济南去谋生的，经过不知多少艰难险阻，终于立定了脚跟。从那时起，我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转学的时候，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老师垂青，从高小开始念起。

我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我开始学英语。

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我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上课是在晚上。学的时光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而已。我当时有一个怪问题：“有”和“是”都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叫“动词”呢？后来才逐渐了解到，这只不过是一个译名不妥的问题。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我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我这个人颇有点自知之明，有人说，我自知过了头。不管怎样，我幼无大志，却是肯定无疑的。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我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我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我翻出来了，只是为了不知道“已经”这个词儿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间。结果我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我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我们的学校濒

临大明湖，风景绝美。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当然对老师另给报酬。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至于我们的正式课程，国文、英、数、理、生、地、史都有。国文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背诵。英文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士比亚乐府本事》、《纳氏文法》等等。写国文作文全用文言，英文也写作文。课

外，除了上补习班外，我读了大量的旧小说，什么《三国》、《西游》、《封神演义》、《说唐》、《说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等等无不阅读。《红楼梦》我最不喜欢。连《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我也阅读。这些书对我有什么影响，我说不出，反正我并没有想去当强盗或偷女人。

初中毕业以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两位老师的姓名我都忘记了，只记住了绰号。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注疏都在内，据说还能倒背。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他对我的影响极大。记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完全出我意料，这篇作文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我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

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谈到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别同学很难同我竞争。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我也学了德文。

由于上面提到的那些，我在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而且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因此受到了王状元的嘉奖。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当然更出我意料。我从此才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要追究动机，那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持自己的面子，决不能从甲等第一名落到第二名，如此而已。反正我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贯”，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这是不是就改变了我那幼无大志的情况呢？也并没有。我照样是鼠目寸光，胸无大志，我根本没有发下宏愿，立下大志，终身从事科学研究，成为什么学者。我梦寐以求的只不过是毕业后考上大学，在当时谋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抢到一只饭碗，无灾无难，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而已。

一九二九年，我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前

两位是我的业师。胡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现代文艺，也就是普罗文学。我也迷离模糊，读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曾写过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大概是东抄西抄，勉强成篇。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他筹办的杂志上发表。不幸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仓促逃往上海，不久遇难。我的普罗文学梦也随之消逝。接他工作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是“全校之冠”。这当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之所以五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在这里，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本也以白话为主。我自己却没有放松对中国旧籍的钻研。我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方面仍然很杂。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等诗人、词人的作品，我都读了不少。这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积极的影响。

一九三〇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由于上面说过的一些原因，当年报考中学时那种自卑心理一扫而光，有点接近狂傲了。当时考一个名牌

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我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我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我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了清华，因为，我想，清华出国机会多。选系时，我选了西洋系。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选某种语言一至四年，就算是专修某种语言。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大一国文”、“一二年级英语”等等。

我的专修方向是德文。四年之内，共有三个教授授课，两位德国人，一位中国人。尽管我对这些老师都怀念而且感激，但是，我仍然要说，他们授课相当马虎。四年之内，在课堂上，中国老师只说汉语，德国老师只说英语，从来

不用德语讲课。结果是，学了四年德文，我们只能看书，而不能听和说。我的学士论文是 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指导教授是 Ecke（艾克）。

在所有的课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顺便说一句，我在大学在课余仍然继续写作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那样几篇散文竟给我带来了好处。一九二四年，清华毕业，找工作碰了钉子。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我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我那几篇散文就把我制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我是在心里直打鼓：我怎么能教国文呢？但是，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我于是横下了一条心：你敢请我，我就敢去！我这个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一变而为国文教员。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堂而皇之当起国文教员来。我只有

二十三岁，班上有不少学生比我年龄大三四岁，而且在家乡读过私塾。我实在是如履薄冰。

教了一年书，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我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我选的主系是印度学，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 and 斯拉夫语言学。我学习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还选了不少的课。教授是 Sieg、Waldschmidt、Braun 等等。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剧烈进行。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我忍受了空前的饥饿，终日饥肠辘辘，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我怀念祖国和家庭。“烽火连六年，家书抵亿金。”实际上我一封家书都收不到。就在这样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苦读不辍。一九四一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是：《〈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格》。

在这一段异常困苦的期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德国老师的工作态度和对待中国学生的态度。我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异

邦青年。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歧视之意，而且爱护备至，循循善诱。Waldschmidt 教授被征从军。Sieg 教授以耄耋之年，毅然出来代课。其实我是唯一的博士生，他教的对象也几乎就是我一个人。他把他的看家本领都毫无保留地要传给我。他给我讲了《梨俱吠陀》、《波你尼语法》、Patanjali 的《大疏 54321》、《十王子传》等。他还一定坚持要教我吐火罗文。他是这个语言的最高权威，是他把这本天书读通了的。我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同学的还有比利时 W. Corvreur 博士，后来成了名教授。

谈到工作态度，我的德国老师都是楷模。他们的学风都是异常地认真、细致、谨严。他们写文章，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德国学者的“彻底性”（Grundlichkeit）是名震寰宇的。对此我有深切的感受。可惜后来由于环境关系，我没能完全做到。真有点愧对我的德国老师了。

从一九三七年起，我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这个系设在一座大楼的二层上，几乎没有人到这座大楼来，因此非常清静。系的图书室规模相当大，

在欧洲颇有一些名气。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到这里来看书，我就碰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英国的 Arthur Waley 等。我在这里也读了不少的中国书，特别是笔记小说以及佛教大藏经。扩大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面。我在哥廷根呆了整整十个年头。一九四五年秋冬之交，我离开这里到瑞士去，住了将近半年。一九四六年春末，取道法国、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我的留学生的生活，也可以说是我的整个学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我三十五岁。

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来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按当时北大的规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只能任副教授。对我当然也要照此办理。也许是我那几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论文起了作用。我到校后没有多久，汤先生就通知我，我已定为教授。从那时到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四十二年，我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过。期间我担任系主任三十来年，担任副校长五年。一九五六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十年浩劫中靠边站，挨批斗，符合当时的“潮流”。现在年近耄耋，仍然搞教学、科研工作，从事社会活动，看

来离八宝山还有一段距离。以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经历，没有什么英雄业绩，我就不再罗嗦了。

我体会，一些报刊之所以要我写自传的原因，是想让我写点什么治学经验之类的东西。那么，在长达六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我究竟有些什么经验可谈呢？粗粗一想，好像很多；仔细考虑，无影无踪。总之是卑之无甚高论。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已。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严密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它不对吗？不行，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不说。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上面讲的是精神方面的东西，现在谈一点具体的东西。我认为，要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在四个方面下工夫：一，理论；二，知识面；三，外语；四，汉文。唐代刘知几主张，治史学要有才、学、识。我现在勉强套用一下，理论属

识，知识面属学，外语和汉文属才，我在下面分别谈一谈。

一、理论 现在一讲理论，我们往往想到马克思主义。这样想，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必须注意几点。一，马克思主义随时代而发展，决非僵化不变的教条。二，不要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对它可以批评，也可以反驳。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把黄的说成是黄的，是唯物主义。把黄的说成是黑的，是唯心主义。事情就是如此简单明了。哲学家们有权利去作深奥的阐述，我辈外行，大可不必。至于辩证法，也可以作如是观。看问题不要孤立，不要僵死，要注意多方面的联系，在事物运动中把握规律，如此而已。我这种幼儿园水平的理解，也许更接近事实真相。

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古今中外一些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也要认真学习。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是没有的。这就是和真空一样，绝对的真空在地球上是没有的。中国古语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

也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千万不要像过去那样把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教条化，把唯心主义的标签一贴，就“奥伏赫变”。

二、知识面 要求知识面广，大概没有人反对。因为，不管你探究的范围多么窄狭，多么专门，只有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你的眼光才能放远，你的研究才能深入。这样说已经近于常识，不必再做过多的论证了。我想在这里强调一点，这就是，我们从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学一点科学技术知识，能够精通一门自然科学，那就更好。今天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是，学科界线越来越混同起来，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越来越多。再像过去那样，死守学科阵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此外，对西方当前流行的各种学术流派，不管你认为是多么离奇荒诞，也必须加以研究，至少也应该了解其轮廓，不能简单地盲从或拒绝。

三、外语 外语的重要性，尽人皆知。若再详细论证，恐成蛇足。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一点：从今天的世界情势来看，外语中最重要的是英语，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语。这种语言，我们必须熟练掌握，不但要能读，能译，

而且要能听，能说，能写。今天写学术论文，如只用汉语，则不能出国门一步，不能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交流。如不能听说英语，则无法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情况就是如此地咄咄逼人，我们不能不认真严肃地加以考虑。

四、汉语 我在这里提出汉语来，也许有人认为是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我还不能说汉语吗？”“我还不能写汉文吗？”是的，你能说，也能写。然而仔细一观察，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的汉语水平是非常成问题的。每天出版的报章杂志，只要稍一注意，就能发现别字、病句。我现在越来越感到，真要想写一篇准确、鲜明、生动的文章，决非轻而易举。要能做到这一步，还必须认真下点工夫。我甚至想到，汉语掌握到一定程度，想再前进一步，

比学习外语还难。只有承认这一个事实，我们的汉语水平才能提高，别字、病句才能减少。

我在上面讲了四个方面的要求。其实这些话都属于老生常谈，都平淡无奇。然而真理不往往就寓于平淡无奇之中吗？这同我在上面引鲁迅先生讲的笑话中的“勤捉”一样，看似平淡，实则最切实可行，而且立竿见影。我想到这样平凡的真理，不敢自秘，便写了出来，其意不过如野叟献曝而已。

一九九八·三·十一

作者：季羨林

来源：新华网

■ 史苑钩沉

回忆周炳琳老师

“尊敬的周老师，弟子从未忘记过您的嘱咐，尽我所能，在外国经济史研究中作出成绩。”

一

我是 1951 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那时，周炳琳先生早已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了。但我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内，没有机会同他见面，也没有机会听他的课，因为二、三、四年级同学和系里的许多教师，都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到广西土改去了。参加土改工作团的教师先回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学生晚回校，大约在 1952 年初夏才回到北京大学。

接着 1952 年夏季开始了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从城里的沙滩迁入西郊燕京大学校址，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并入北大。那年秋季，我们就在燕园上课。我是先认识经济系的赵迺抃教授，再通过赵迺抃教师认识周炳琳教授的。记得两位教授同住在燕东园教授宿舍 29 号，两层小楼，赵老师住在楼上，周老师住在楼下。

他们两位都已是五十多岁的长者，学生们尊称他们为周老、赵老。赵老师专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周老师专治外国经济史。在我上学期间，他们只做研究工作，没有开课。所以我并没有听过他们讲课。

我认识赵老师在先，那时他刚从广西参加土改回京，我们还没有从城内原校址迁到西郊新校址。在沙滩区有一座法学院大楼，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三个系都在这里办公。楼内还有一个法学院图书阅览室，我是里面的常客，没有课时，我就到那里去借书、阅读。赵老师也经常去。由于阅览室里学生很少，所以赵老师去久了就感到奇怪，怎么这个学生这么勤快，老在这里读书，就问我是几年级的，我说是刚入学的，一年级下学期的学生。那天我刚好读的是一本英文的西欧经济史的书籍，我一边读，一边把书内的资料摘录在笔记本上。赵老师很感兴趣，就说：“周炳琳教授是研究西欧经济史的，以后我请他指点指点你。”赵老师还把他家庭的地址告诉

我，他住在东四十条的宿舍里，欢迎我到他家里去。但当时我没有机会认识周老师。

学校迁到西郊后，赵老师和周老师同住一栋小楼，楼上楼下。大约是1952年放寒假期间，有一天我去赵老师家，谈完后他对我说：“我已经向周先生提到你了，说有一个学生对西欧经济史很感兴趣，周先生说让他来找我吧。今天周先生在家，你去他家看看他，他会指教你的。”这样，我下楼到了周先生家。那天，刚好周老师在家，师母魏璧老师也在，我就同两位老人畅谈起来了。周先生问我对什么问题感兴趣，我说我一直想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并告诉他们我读过哪些书。周老师很高兴，说现在的大学生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不多了。

从那以后，直到我大学毕业，我每次到燕东园教授宿舍，都是先到赵老师家，再到周老师家。但周老师的社会活动多，所以有时没有见到周老师。赵老师和周老师两人的藏书颇丰，有些英文书北大图书馆没有，我常在两位老师家中借阅。这些书籍对我打下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基础是非常有用的。我常想，在大学学习阶段如果能比较扎实地打好基础，对今后的成长的影响，时间过去越

久，越能有较深的体会。

二

1955年我自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担任资料员，但编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作为周炳琳教授的助手，帮助他整理、收集外国经济史的资料。这样，我就有机会同周炳琳老师经常在一起了。分配工作后，我第一次到周老师家里去时，他十分高兴，对我说：“我知道你俄文不错，已经翻译了几本俄文书出版，你帮我翻一些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供我们参考。”又说：“如果时间富裕，你不妨把北大图书馆内所藏的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历年刊载的经济史论文一一编写内容摘要，供教师们参考，这不仅对大家有好处，对你自己也很有好处。”周老师的这一建议使我一生受益，因为从此我开始在周老师的指引下进入西欧经济史这一学术领域。

从周老师家里出来后，我又到了赵迺迺老师家中。他知道我留在北大经济系当资料员了，很高兴地对我说：“你没有当教员，当了资料员，心里要想开些，不要计较名份，只要有真才实学，

名份算个什么？”还说：“周先生为人正直，他很器重你，你继续努力，做学问吧！”赵老师和周老师是几十年至交，周老师年龄稍长于赵老师，他们两老对我的培养、扶植，使我终身难忘。

稍后，我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借到了苏联学者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读后感到这部书如果翻译成中文，一定有助于当时国内缺少外国经济史参考书的教师和学生。于是我先把该书的目录译出来，送给周炳琳老师看。他觉得可以翻译此书，于是列入了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的工作计划。全书40万字，我一个人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全部译出，并交给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当时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我每译完一章，就整理出来，誊清交给周老师审阅。周老师仔细阅读，哪些译名需要斟酌，他都标上记号，同我商量。尤其是有关法兰克王国封建土地关系的术语译名，他都再三推敲。周老师的法语很好，但他依然十分谦虚，总是说“供你参考”。对于法国波旁王朝的社会性经济变更，他提了不少看法，这些都是他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我记得当时他的一句插话：“现在对法国大革命中群众行为的评价似乎过头了。”虽然只是简

短的一句，却令人深思。可惜那时我还年轻，对周老师这句话的理解还不深。

在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中，有整整一章是讲述拜占庭经济史的。以前，对于拜占庭的兴亡我是不了解的。这一章的翻译过程也是我学习拜占庭经济史的过程。译完这一章后，我照例交给了周老师审阅。他说：“这一章的内容很有意思，我要细细读。”把稿子还给我时，他对我说：“苏联学者对拜占庭的研究比较深入。你知道吗？俄罗斯一直以第三罗马自居，罗马是第一罗马，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是第二罗马，俄罗斯自称是第三罗马。要了解俄罗斯，离不开对拜占庭的了解。”我记住了周老师的指点，所以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拜占庭历史以及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这本书于1957年初译完，交给了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了。稿费是归学校的，但我分得了约20%的劳务费。结婚、安家和把我的外祖母、母亲和弟弟（厉以平）由武汉接到北京来住，全靠这笔劳务费。

三

紧接着展开了“反右”斗争。会议越来越多，教师都忙于开会。这段时间

内，教师为了避免惹麻烦，串门的少多了。我没有到赵老师和周老师的家中去看望他们。到了年底，北京大学的教师分批到北京门头沟区（当时称京西矿区）的农村下放劳动，1958年初出发。我是第一批下放的，整整一年在西斋堂村。到1959年春季才返回北京大学校园。这时，北大经济系设立了编译组，我转到编译组工作，从事英文经济学资料的编译，有空就又到赵老师、周老师家中请教。

1959年到1961年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食品供应紧张。我已有一个孩子，妻子远在辽宁鞍山，两地分居，租了海淀苏公家庙四号院三间简陋的平房居住，三间小房子加起来不过二十多平方米，上有外祖母、母亲，此外还有弟弟厉以平在北京101中学读书，生活相当艰难。幸亏我还利用晚间从事翻译，赚些稿费，贴补生活。令我感动的是，周老师、赵老师两老都从北大步行到我简陋的家中来探望我。他们看到我家如此清苦而仍埋头读书和翻译，不断对我勉励和安慰。此情此景，至今仍铭记于心。

从这时起，我到两位老师家中去访谈时，题材已经不限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了。我们都对现实的经济状况畅谈自

己的看法，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主要不是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政策的失误所导致。周老师认为我人品可靠，所以在谈话中没有什么顾忌，直抒自己的观点。今天回想起来，当时我的认识是有限的，我只认识到这些都是政策失误的后果，而政策之所以失误，则是由于下情不能上达，甚至基层隐瞒实情，才导致政策制定出了偏差。当时我没有认识到是经济体制的弊端所致。大约十年之后，即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再到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农场下放劳动，目睹了农民的艰苦生活之后，我才进而认识到正是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这些灾难。我个人经济思想的转变，并非开始于三年困难时期，而是开始于鲤鱼洲农场下放劳动期间。

四 周炳琳

1962年，周老师患上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匆匆赶到医院，那时他还能下床走走，师生二人在病房前面走廊的靠椅上交谈很久。周老师清瘦多了，我说：“现在政策已经宽松些了，市面上的供应也比前两年丰富一些了，看来情况正在好转。”他

点点头，只说了一句：“但愿如此。”接着他把话题转到了我的工作上来。他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说仍在研究外国经济史，并且和马雍同学着手翻译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周老师笑了，他说：“这可是一部世界名著啊，罗斯托夫采夫另一部世界名著是《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译完这本再译那一本吧，你们都才30岁出头，大有可为啊。”今天可以告慰周老师的是：《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在1965年就译完了，交给了商务印书馆，接着开始了十年动乱，拖到1985年才出版。至于《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一书，我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再从事翻译了，况且马雍同学也已在1985年《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译本出版后不久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到哪里去找一位互译互校的同龄合作伙伴呢？

1963年周老师逝世。在追悼会上，我痛哭失声。师母魏璧老师握住我的手，一边哭，一边叮嘱：“周先生把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要多多努力啊！”从1963年到现在，已经47年了。魏璧老师也早已谢世。当年参加周老师追悼会的北大经济系的教师中，不少人也先后离开了人间，但追悼会的情景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因为周老师是

最早把我领上西方经济史研究道路的恩师。

1993年，周老师逝世30周年之际，我曾经一首七绝表达了对周老师的怀念和崇敬。

七绝纪念周炳琳老师逝世三十周年一九九三年旧事模糊淡淡痕，
只知冬冷未知春，
先生不顾潮流议，
夜半邀谈深闭门。

外国经济史一直是我的第一研究方向。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一度被借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我把研究的重点转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问题。

1988年起，我连续担任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又转入全国政协，担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我的研究重点在这些年内一直是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证券法和资本市场、就业、民营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和二元体制、城镇化、贫困地区发展等等。但外国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始终未中断。可以告慰周老师的是，我们的外国经济史专著《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

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已经出版；《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即将出版；《希腊古代经济史》上下两卷：上卷《希腊城邦制度》、下卷《希腊化时期》，正在整理过程中。此外，我的外国经济史论文集《西方经济史的探讨》也出版在即。尊敬的周老师，弟子

从未忘记过您的嘱咐，尽我所能，在外国经济史研究中作出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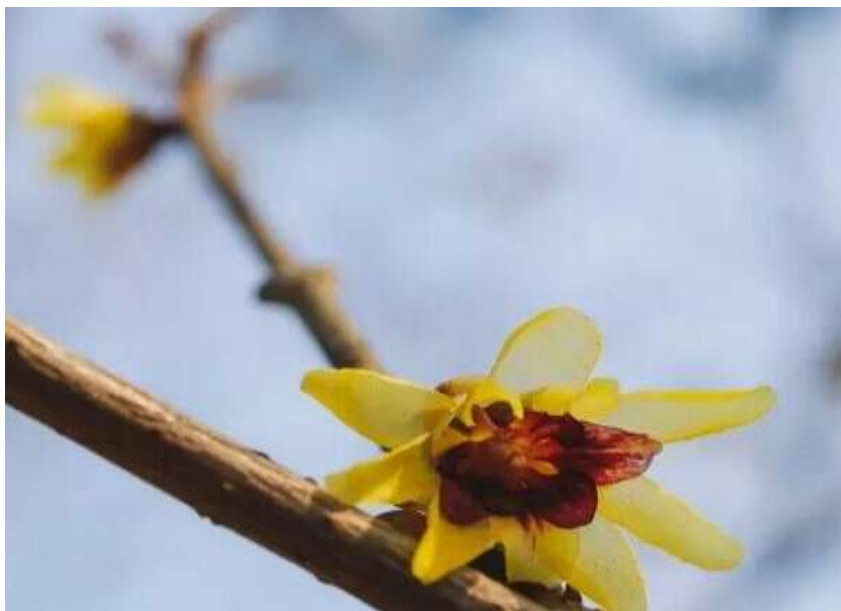
来源：北大校友会微信公众号

作者：厉以宁

■ 大美北大

风穿花间春初浅

春，寄来些花。风做她的信使，阳光为她伴唱。每个挤在枝头的可人儿，都有一个秘密，你开心地笑，她们便会慷慨地说给你听。







来源：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
摄影：于浩，陈丽芳，孙耀明

学员心声

北大的细节

我是一个愧疚心特别重的人，如果有了承诺没有实现就会一直地谴责自己，比如当年我的室友在我的毕业留念册上写了“一句话一辈子”，我至今自责自己没有按照当时的约定把结婚的照片给她寄一张过去。毕业后，我们两个无任何的联系。十五年过去了，而那个约定却经常地在心里勾出一声叹息。有机会出去旅游了，自己就给自己定了条规矩——到过的地方要写篇文章纪念一下。也没有全部履约，秦始皇的兵马俑，写不了，太恢弘太震撼；孔府孔庙孔林，没敢写，太沉太重太厚。

而北大，我是揣着一份我可以写一写的心意在里面度过了国培的那十天。

三个月过去了，期间我给学生做了一个北大的专题课件，给他们介绍北大的草木、建筑以及教授；我也整理了北大学习资料并写了两份学习心得。可是，我写北大的什么？北大的什么，我都是知之甚少。与北大而言，

我只是它每天接待的无数的学习者参观者中的一个。于我而言，它却是我一直艳羡倾慕遥想的一个图腾般的所在。

将跟北大有关的记忆，梳理了一遍又一遍。我想，我可以写一写北大，写一个细微的北大，写一点我看到的北大里的细节。

正是叶落的时节，金黄的银杏叶、赭红的枫树叶，绿色的柳树叶，硕大的白杨叶子，落满了甬路、石阶、湖水。没有人打扫。堂吉诃德雕像的肩膀上满是的。自行车的车胎都被埋了起来。雨后的水洼里堆积着色泽已经不再好看了的。台阶上有被踩烂的。就是没有人清扫。很多的人在拍照，蹲着、坐着，有的都趴到了在地上。保安在旁边笑微微地看，甚至帮着挪挪自行车或着挪挪自己的身体。

英杰报告厅里进行了一场招聘会，要接着举办一次创业演讲。工人在拆卸用铝合金支架搭起来的隔间。一个矮胖的男子站在梯子上背对着我

拆支架。一条铝合金横杆在他的手里那么长时间！他试着扔到地上，试着竖着顺梯子滑下去，试着搁在梯子横木上，最后他选择横放在梯子最顶的平面上。在卸下了隔间最上端的四根横杆后，他一并拿着从梯子上下来，弯腰把横杆放到了地毯上，又踩着梯子爬上去，如此这般地拆放着其他的支架。那么厚的地毯呀，踩上去悄无声息的，那些横杆扔下来的话，也同样是如同落入棉花堆中，没有多少声响的。可他偏偏没有那么省时省力地做。

所有的工人都是轻手轻脚又麻利迅速的。拆完了隔间便是排上报告会用的椅子。一切井然有序流畅安静。有个女孩子想喊另一个，嘴都张开了，又把喊变成了走。走到跟前，才说。很短的时间里，一个满是招聘广告和花花绿绿招聘间的会场变成了一个几百张高背椅子整齐排列的报告厅，巨大的紫红色的幕墙上，拉上了报告的主题——养猪卖肉比互联网更靠谱。

晚上的理工楼里有一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讲座。整个大厅座无虚席，靠墙的过道里也站满了人。各样的人，尼姑僧侣、黄发垂髫、保安保洁、中年艳妇、清纯少女……

北大哲学系的耕读社是有些名气和传奇人物的，现在的社长是一个圆脸安和的女孩子，搀着老先生到讲台，进行了简短的介绍，语调和缓语气平静。92岁的楼宇烈教授坐下后便开讲，不用话筒不看讲稿。近三个小时，无人退场，没有手机铃声，亦无喧哗私语声，有掌声笑声。结束后，路灯里有一位拄拐而行的听众随着人流向东门方向走去。我目送很久，慨叹很久。那个与众不同的带着浓重孤独的背影，被我一次次地忆起。

寻找楼教授讲座的教学楼时，我撞进一栋正在上夜课的楼里。很多学生在教室外面的桌子上学习，一本一本厚厚的书摆在他们面前。观察了一下，我确定一个正在看书的人应该是北大里的讲师或是教授，在说明我的意图后，她开始打电话，声音低低的，然后又找课程表，又找微信群，最后告诉我讲座在哪座楼里，显眼的标识有哪些，并提示我可以问一下路，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到的。

从一个非常简陋窄小的偏门进入北大的校园，顺着排满自行车的水泥砖块路直行后左拐，便是我们可以用餐票吃饭的地方。第一次看到价目表，吃惊极了：一份小米粥两毛钱，一个

鸡蛋五毛钱，一份咸菜一毛钱。饭量小或是减肥的孩子吃一个早餐花不上一元钱。而就在那条两边全是自行车的小路上，我看到一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牵着手走。只看见这么一次。其他的学生模样的，要不脚步匆匆要不埋头吃饭要不背着超大的背包戴着耳机一副旁如无人的样子。没有看到夸张的妆容和衣饰，甚至有的孩子穿的还相当的朴实，像高中生。

其实走在校园里，坐在餐厅里，看到的不像学生的人多。天南海北的口音，一群一群的，有的还穿着统一的制服戴着统一的徽章。这些参观学习的人在北大里呼喊、评论、张望、指点，到处拍照，还有的抽着烟溜达，然后把烟头弹到地上。打饭时，学生会侧身让某一个大肚腩的男人先选菜盘，也会指点一下一个大姨如何使用打孔卡。他们对于我们这样的人的到来和逗留已经习以为常。

还有很多的细节，像报告厅厕所里的鲜花，多媒体教室里每天张贴的活动安排，静园里荒芜的草径紧锁的

院门，未名湖畔在喧闹声中安静读书的男孩……

在未名湖的一个小岛上，有一棵古老遒劲的枫树，红叶正好，在冲破云层的阳光的照耀下，美得让人窒息，让人无法用文字表达对它的敬意和爱慕。我在树下拍了很多的照片，舍不得离开。其中一幅是踮着脚尖伸出双手去捧接阳光。金灿灿的阳光里红艳艳的枫叶下，我的虔诚是贞纯和热烈的。

不知还有没有再去北大的机缘。

它依然端居在遥远的北京，我用自己素朴的文字记录它给我留下的吉光片羽，不是因为自己曾经定下的规定，只是因为北大就是北大，我想写它，也能写一点它。

2016年2月25日星期四晚

二十二点十一分

作者：侯维玲

莱州市教师进修学校